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巨大的恐惧，沉默的声音

明朝宫廷政治那些事

政治心理学时代的到来

周恩来的留东岁月

这个时代的“生”与“死”

如何破解玲珑棋局

那只怪兽又来了

一个熊孩子引发的罗生门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 庆 言 一
夏佑至 扬 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扬 克

观察员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刘 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 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 克（德国·图宾根）
灵 子（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朱 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北京）

2013年10月 第7卷第9期

总第69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2013年以前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2013年各期精排版“独立阅读”均可在多看阅读免费下载：

www.duokan.com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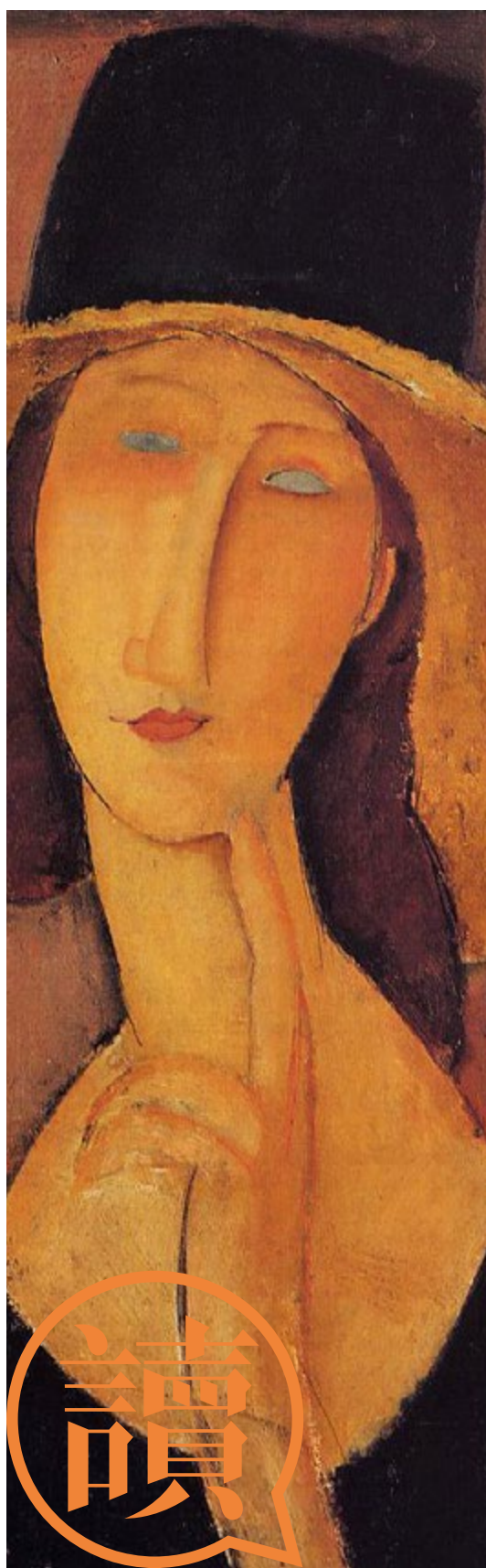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人有一条定理叫“天下乌鸦一般黑”，因着这条定理，但凡自家里出了什么丑事坏事，就有了辩护的借口。人们会故作老成的说，别人家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一旦欧美各国出了什么负面新闻，很多国人便兴奋无比，他们会以一副洞烛先机的语调说，我早就说了，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却鲜有人反思一下，按照这个逻辑，其实就是承认了自己也不是好东西。也许，坏东西并不在意自己是好是坏，但却见不得这世上有比自己好的东西。好在最近大洋彼岸的华人向我们显示出，确实，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地方，没有公平正义从天上掉下来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就此忍受现状，在有的地方，我们能够让那些坏东西不那么肆虐猖狂。既然在有的地方可以，为什么在别的地方不行？



目录

封面用图

jeanne hebuterne of a door
Amedeo Modigliani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005-010

文 史 • 王晓渔

摄 影 • 夏佑至

书评

• 戴新伟

巨大的恐惧, 沉默的声音

• 孙晓骥

明朝宫廷政治那些事

• 吴 强

政治心理学时代的到来

01-023

随笔

• 刘 柠

周恩来的留东岁月

• 成 庆

这个时代的“生”与“死”

• 严 飞

如何破解玲珑棋局

024-034

争鸣

• 罗四鸽

那只怪兽又来了

• 朱芳艺

一个熊孩子引发的罗生门

035-049

讀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l978@sina.com）

在苏州参加新历史合作社的“历史嘉年华”活动，遇到章东磐先生，他和他的团队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了许多朝鲜战场的照片，展现了“敌人”眼中的那场战争。回来后，在书架上发现他的《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手不释卷地读完。

中国的军迷常是国家主义者，把神话置于真相之上，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性之上是他们的两个显著特征。《父亲的战场》截然不同，章东磐注重真相，也更为尊重人性。上个世纪中叶，“外御其侮”之后兄弟迅速“阉于墙”，此后中国远征军的士兵成为被“城头变幻大王旗”殃及的池鱼，在余下的几十年时间里辗转于沟壑。在这段历史即将随着老兵的远去而消失之际，章东磐和朋友们来到滇西抗战的战场，寻访中国远征军的老兵。章东磐对老兵们充满敬意，但是并未因此放弃对真相的探寻，他会认真倾听老兵的回忆，同时冷静地指出那些自我放大之处。这种认真和冷静，是对历史最好的敬意。

网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流传一则孙立人将军的“佳话”，称他的军队在缅甸俘虏日本士兵1200名，下属请示如何处理，他说：“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还有一种说法是，去过南京的一律就地活埋。）这让我一度对孙立人颇有腹诽。叶兆言先生在《陈年旧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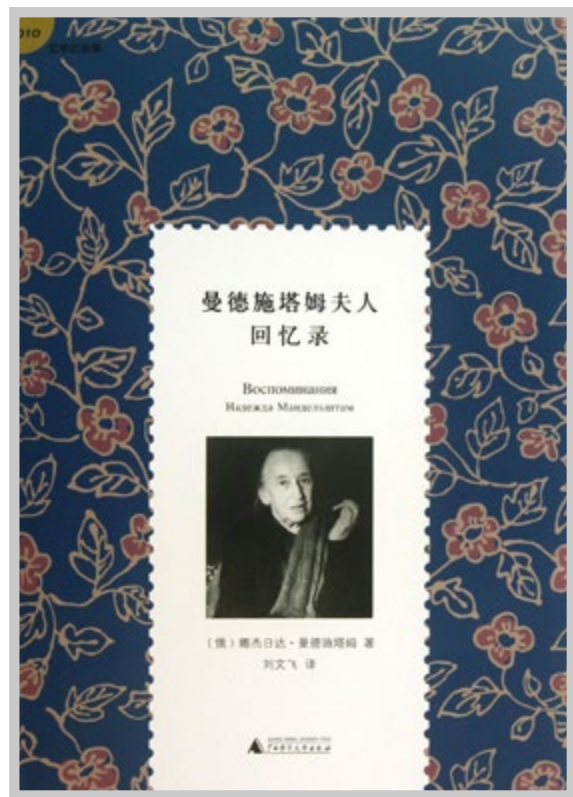
信出版社，2013年5月）里提及，一位三十八师老兵托人打电话给他，表示此事纯属虚构。这种完全无视战争法的虚构“佳话”，与其说是对孙立人的神话，不如说是对他的妖魔化。章东磐在书中对孙立人、戴安澜的神话予以降温，他指出仁安羌之战不可称为“大捷”，当时总体劣势的中国军队无力歼灭任何成建制的日本军队。他还指出，腾冲万民跪拜戴安澜将军遗体的感人故事，也纯属虚构，在将军牺牲前十天，腾冲就已经陷落，将军遗体不可能经过腾冲。略有遗憾的是，书中对“狼牙山五壮士”的描述，未能脱逃文学化想象的成分，关于这个事件，洪振快先生撰有《“狼牙山五

壮士”的细节分歧》（《炎黄春秋》2013年11期），可供参考。

“当时已是傍晚，橱柜在墙壁上留下一道暗影，她就坐在那暗影中抽烟。那道影子十分地暗，只能在其中辨别出烟头的微光和两只闪烁的眼睛。……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余烬，一块阴燃的媒，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布罗茨基这样回忆最后一次见到曼德施塔姆夫人的景象，这本《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仿佛一块随时可以燃烧的煤。书中出现很多熟悉的名字，只是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以担惊受怕的、处心积虑的表情出现，有时则是捕风捉影的、与时俱进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写出了时代的孤独，她这样解释孤独：“孤独并非指缺少朋友，我们始终有很多朋友，而是指你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听不见各种警告，闭着眼睛继续行走在可怕的自相残杀的道路上，并裹挟了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她和曼德施塔姆应对这种境遇的方式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停止开玩笑”，当负有告密使命的邻居来家中做客，曼德施塔姆总是嘱咐夫人端上茶水：“此人是在工作，需要喝点茶……”

苦难是一笔财富？布罗茨基提醒读者，曼德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在革命前就已是伟大诗人，“说伟大的艺术离不开苦难，这是一种卑鄙的谎言。苦难会让艺术失聪失明，会摧毁艺术，时常还会杀害艺术。”

2012年，莫言先生赴斯德哥尔摩领取诺



贝尔文学奖时，将审查制度比作机场安检，为审查制度开脱，引发轩然大波。他的这种表态，是长期自我审查的结果，只是从最初的被动逐渐内化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洛卡蒂斯 等著，吴雪莲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0月）讲述了秘密读者和审查制度的博弈。正如“民主德国”指的恰恰是历史上那个“不民主的德国”，托马斯·克莱因——他在民主德国时期曾被监禁——这样说：“即使在专制体制下，也常常伪善地强调：‘思想是自由的。’可谁要是准备把自己的所想说出来，那他可能还是会遇到麻烦。”民主国家并非不存在审查，但是把民主国家的审查与专政国家的审查等量齐观，是天真而危险的，把审查等

同于安检则是过于深谋远虑的。

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先生的词集《乐斋集》（线装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简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最近获得关注，其中两首词广为流传。一首是《浣溪沙·组建新学院》：“喜气洋洋进会堂，资源整合创新强。院旗一展掌声长。好事多磨磨好事，文章难做做文章。紧随时代共辉煌。”另一首是《浣溪沙·温总理看望人大学子》：“总理英姿健步来，万千学子笑颜开。欢呼夹道队排排。一路声声频问好，千言句句尽关怀。殷勤答问唱和谐。”这本词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术顾问饶宗颐先生题写书名，另一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顾问叶嘉莹先生为其撰写序言：“纪先生既具新时代之

精神，更对旧文化有倡导之热心，故其写之于词，乃有古今新旧兼容并蓄之妙。……其词作内容之多，含蕴极广，凡此种种自非传统旧词之闭守书斋吟风弄月者之可相提并论。”这篇序言有些意外，却又不太意外。1974年，叶嘉莹自海外返回大陆，写下长诗《祖国行》：“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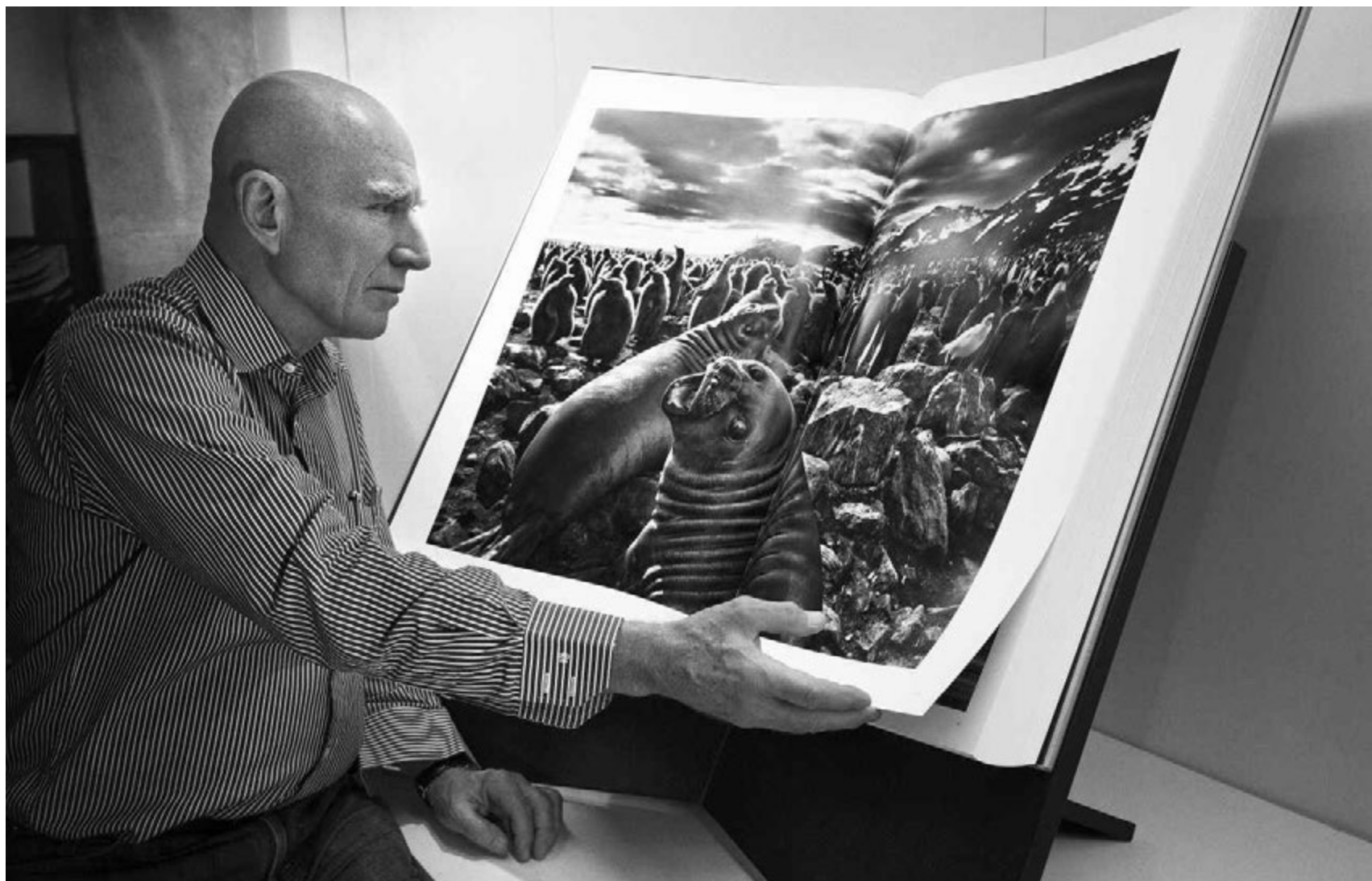
偶然得到《行政诉讼110个胜诉案例》（刘继纯 等著，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9月）。在中国进行行政诉讼，胜少败多，这里辑录的胜诉案例只是少数，如有败诉案例集锦，更适合当做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阅读。但是这本书的最大价值似乎不在正文，在“选编者言”，它本身就是魔幻现实的产物。Q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这世界上谁在干NGO呢？有个干NGO的朋友自嘲说，是所谓“三失”——失业、失恋、失常人士，这未免言过其实。我认识的NGO人士虽然不多，但都很正常，甚至有几个智商情商明显超出常人。如果说与其他行业有什么不同，只能说这个群体中当然的左派比例较高。所谓当然的左派，是指对政治的认知尚属于中左，对经济认知则属于极左——这两者如何调和，我一直没想明白。看过以上文字的读者，请不要拿中国的新左派来插科打诨，下面要说的都是严肃的事。

纪实摄影师中，左派是很多的，所以关于贫困、革命和抽象人性的摄影报道特别多。这三个词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情境，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那就是平等。贫困是革命的动因，而革命是平等的实现，这不难理解，何为抽象人性，摄影如何表现抽象人性，以及抽象人性与平等的关系，则需要以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为例，略加申说。

萨尔加多是巴西人，生于1944年，属于战后一代。他是学经济学的，在巴西念完了硕士，移居欧洲，在巴黎大学完成了经济学博士



图为萨尔加多

课程（不能确定是否拿到了学位），接下来干过一阵子NGO，为世界咖啡组织做调查，写报告，不可避免地填了很多表格。以他的性格，很快就觉得这样的人生前景颇为可疑。他决定改行去拍照片，成了大器晚成的摄影大师，是摄影这个行当的幸运，因为不是谁都能拍出好照片，但对NGO这个行业来说则无所谓损失，毕竟表格人人都会填。萨尔加多接触摄影很晚，但上手很快，很快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在这个行当里，所谓天赋就是对构图的直觉，但照片背后的观念，却是逐渐积累长期形成的产物，当代经济学训练和NGO里的工作经历变得很关键。

萨尔加多有几本名著，一本是关于人类迁徙的（Migrations, Aperture 2000），一本是关于产业工人的（Workers: An Archaeology of Industrial Age, Aperture 2005），一本是关于非洲饥荒（Sahel: The End of the Roa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最新出版的一本是关于环境变迁（Genesis, Taschen Verlag 2013）的。这些画册大概都能传世。它们共同的特征是主题严肃，加上萨尔加多鲜明的视觉风格。但我看到的，却始终是中国哲人梁漱溟晚年的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这样说也许低估了萨尔加多作为左派的批判性和充沛的道德激情。梁漱溟是个人世的儒家，但又曾在北京大学教授佛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自强不息的君子，佛教的榜样是证人涅槃的佛陀，照我粗浅的理解，梁漱溟对世事有一种调和儒释的看法，即是说，现实中的

道德完善与终极的虚无没有互相抵消，反而彼此强化。萨尔加多不见得会认同佛教的世界观。为了拍这些照片，萨尔加多把全世界跑了一个遍，有时候不远万里到某些偏僻的地方去，结果只在书中采用了一张照片。如果计算这些拍摄项目的碳足迹的话，数字肯定很惊人。换句话说，冒着左派内部的批评和右派的嘲笑，萨尔加多拍了这么多照片，难道只是为了一个答案呼之欲出的悲观设问吗？我觉得他的初衷是要批判这个世界，尽管是以一种昂贵的方式——这其实是很多国际性NGO组织的通病。

萨尔加多倾向于从结构的角度看待社会。这是经济学思维的典型特征。他拍摄的移民、工人、饥民和那些被现代文化挤压的前现代部落人物，没有个性，没有名字，没有具体而微的感受。他们的遭遇是特定人群的集体遭遇。结构和群体并非没有价值，只不过个体的感受和遭遇不是重点。换作是经济学家萨尔加多，这样的立场倒也无可厚非，但对摄影师萨尔加多来说，结构主义的眼光与他的平等立场和浪漫风格，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矛盾。

在纪实摄影这个行当里，浪漫的风格往往暗含着道德陷阱，用批评家的话说就是“消费苦难”。读萨尔加多的书，我感到很矛盾。他用广角镜头捕捉人类的悲惨境遇，我却总是首先被视觉之美所吸引，忍不住去推敲富有诗意的影调和构图的隐喻意味，然后才能关注他的主题。萨尔加多辽阔的风格，密集的群像，雕塑般的人物体态，把社会问题抽象成了

美学或哲学体验。我是真喜欢他这种没心没肺追求个人风格的作风，可惜他自己决不能同意。他是当代左派和摄影界的良心，而且是一颗很大的良心。萨尔加多理应生活在争议中和风口浪尖上。🔴



图为萨尔加多作品



巨大的恐惧，沉默的声音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peessoal935@gmail.com）

人沦落为钢笔划在纸上的沙沙声
——布罗兹基，《佛罗伦萨的十二月》

关于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地位，布罗兹基评价为“文明的孩子”，而因为曼氏夫人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回忆录，布罗兹基将她称为“文化的遗孀”。这是一个大诗人对另一个大诗人的价值重估，也是一个曾经遭受国家驱逐的公民对另外两个待遇更坏的同胞的深刻同情和尊敬。“文明的孩子”、“文化的遗孀”，这两个含义丰富、准确又深远的意象，似乎已经说尽了曼德施塔姆夫妇厚重与深沉，但只有当我们开始阅读，才能感受到这种丰富性的回响。它不仅冲击阅读体验，同时也冲击着生命体验。

我说的是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

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重要的诗歌流派

阿克梅派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与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一起被称为该流派的三驾马车。命运都不曾善待他们：古米廖夫被枪决，曼德施塔姆被逮捕、流放，最后死于远东的集中营（甚至没有确切的死因与具体死亡日期），阿赫玛托娃虽然免于流放的命运，但伴随她的却是泼脏水、被监视、儿子被扣为“人质”……，以及终生的恐惧。

这部回忆录所写的，正是曼德施塔姆夫妇从1934年到1938最低谷的时期。在苏联大清洗的1930年代，曼德施塔姆被捕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写了一首讽刺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诗，这首诗被侦查人员称为“史无前例的反革命作品”，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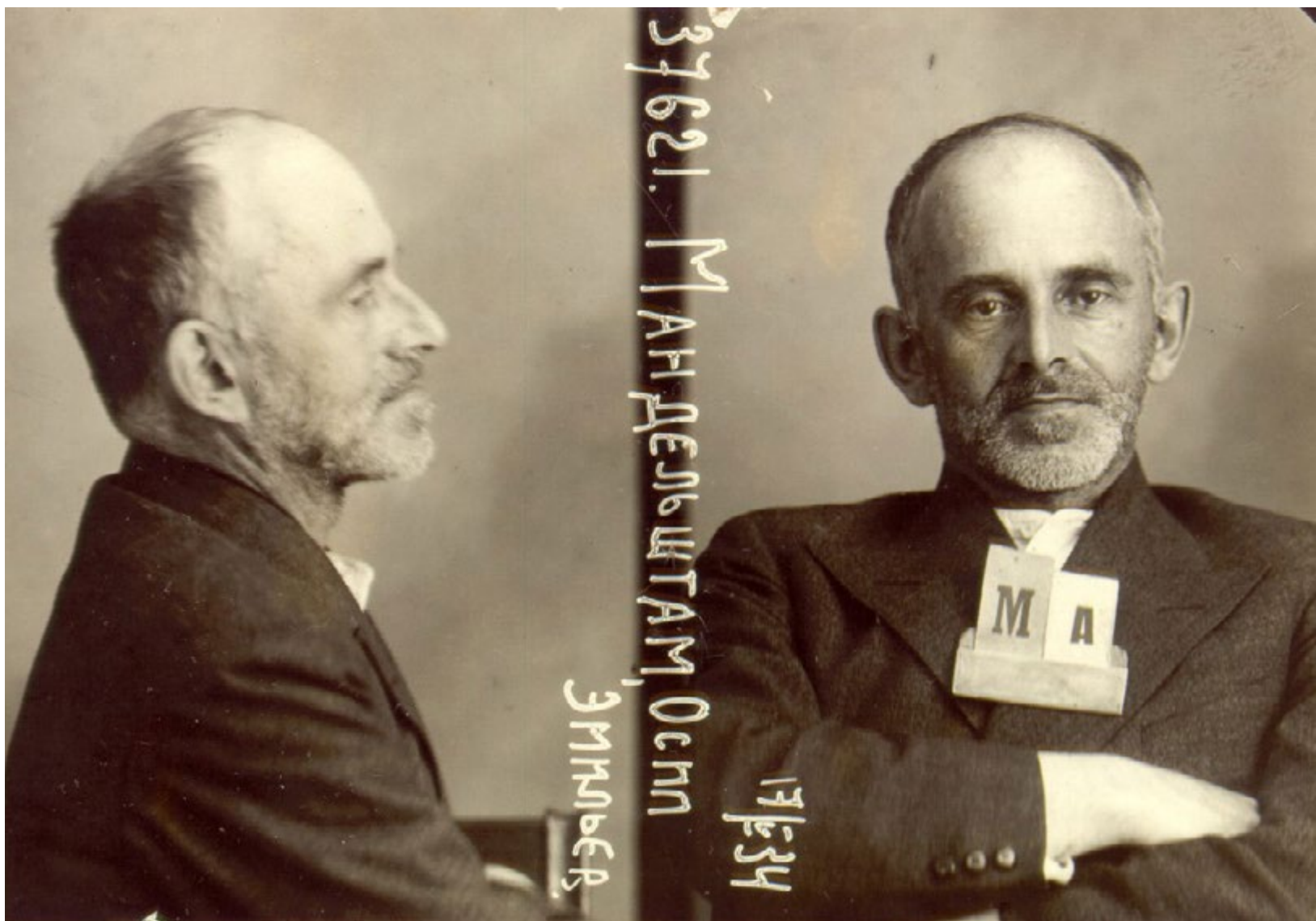
“我们活着，觉不出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便听不见我们的话语，/ 只能听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那个杀人犯和农夫斗士……”

作为诗人的妻子，娜杰日达也投身到了那个年代当家人被捕、家属“四处活动”的潮流中。她找到党的高级干部布哈林，通过布哈林的斡旋，曼德施塔姆得以改判流放沃罗涅日，得到近4年的“奇迹”。只是这对夫妻并未想到，曼德施塔姆的命运在严酷的1930年代基本定型，虽然他不属于清洗得最厉害的上层人物，但他身上展现的，却是苏联被清洗面最广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不可否认，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知识分

子。而这另一种知识分子，却有太多的面目和名字，有时候他们是上级，有时候是朋友，有时候是诗歌爱好者。曼德施塔姆喜欢给人读诗，也经常有他的崇拜者要求（甚至是强行闯入硬要求）抄录他的诗歌，而这些人都有可能向官方举报。曼德施塔姆的命运不仅仅是受制于一首谤诗，从历史上看，他从来都不是左翼的同道。他写的东西越来越与官方的需要背离，生于1891年的曼德施塔姆所面对的是一——“不跟我们走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因此，即使有过4年较宽松的时期，他依然逃不脱被送进集中营的命运。

这是娜杰日达所表达的命运必然性。在所罗门·沃尔科夫为布罗茨基做的谈话录里，他们谈到这个话题。布罗茨基把曼



曼德施塔姆在集中营中的档案照

德施塔姆的最后命运归结为那首颂诗。为什么？因为你把斯大林同志比作沙皇，诗人又做了说出“皇帝新衣”的秘密，这和攻击他是“克里姆林宫的山民”一样触犯统治者的禁忌。我非常佩服布罗茨基的分析，如何读曼德施塔姆的诗与如何理解曼德施塔姆，他都是必不可少的鉴别者。当然，这也适合于我们阅读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时候。

这一切都被陪伴他经历恐怖岁月的“黑暗同志”、娜杰日达所铭记。收到丈夫死讯后，娜杰日达也开始了流亡之路，她四处躲藏，万幸没有再落入契卡人员之手。早在曼德施塔姆去世前，娜杰日达就开始谋划如何保存丈夫的诗歌：手稿、抄本。她有意识地收集曼德施塔姆的诗歌档案。但鉴于那个年代告密盛行，不少所谓的诗歌爱好者同时也是身负任务的人，不能轻易相信，于是除了四处存放抄本之外，娜杰日达用背诵的方法来保存曼德施塔姆的作品，诗歌，散文，她说自己能倒背《第四篇散文》。当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后，她流落到一个纺织工人村斯特鲁尼诺当纺织工人，她在晚上上班的时候背诵丈夫的诗，白天则去莫斯科“四处活动”，“上访”，打听消息。

像娜杰日达这样作流亡者、甚至是有罪者的妻子，作为未亡人的身份保留丈夫的思想，在俄罗斯的文学史上不乏其人。吊诡的是，曾经作过曼德施塔姆庇护人的高级干部布哈林，后来也被斯大林清洗。他被捕前所写的致苏共中央的信，也是由他在监狱和集中营熬了二十多年的夫人背

下来的，直到80年代才公开发表（布哈林1937年被清洗）。

布哈林的斡旋，是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提及听说曼德施塔姆被捕消息的帕斯捷尔纳克去找过他。于是出现了一个“奇迹”，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接到了领袖斯大林的电话，被告知曼德施塔姆会好起来。于是有了诗人曼德施塔姆流放沃罗涅日的“奇迹”。领袖知道这样的奇迹不仅能显示他的仁慈，而且通过帕斯捷尔纳克这位著名诗人的转播，可以作为故事一直流传下去——让不明真相的群众“为奇迹喝彩”。这篇《奇迹之源》是整部回忆录中核心的部分，它显示出在一个有奇迹的社会里，奇迹的可怕；对于旁观者又是经历者的娜杰日达来说，她可谓是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这篇和描写秘密警察的《赫里斯托夫雷奇》、描写曼德施塔姆的弟妇的《非党的塔尼娅》一起，构成了上层、专政工具以及平民之间的一致性。读这些篇章，不能不佩服作者对制度之恶、人性之恶的深刻洞察。

在斯大林死后，环境有所松动，赫鲁晓夫上台，“解冻”开始。娜杰日达的境遇稍有好转，她可以在一所学院教书，找到一份教职，获准回到莫斯科远郊居住（依然是政治上的次等人），直到60年代中才获准回到莫斯科，1980年去世。但已经去世的曼德施塔姆的命运很难说改变了——平反可以限定在纸张上，但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则困难重重。在“另外的知识分子”那里，很显然并不太想听到曼德施塔姆这个名字。娜杰日达始终在为丈夫的书出版



奔走、期待，而她面对的依然是强大的官僚体制，占据其间的各式人等在面对一些“国家蛋糕”时，就会因曼德施塔姆这个名字而起化学反应：会触及敏感区域、会让某些人不高兴、会让自己丢掉饭碗，等等。所以，当曼德施塔姆的诗集1973年终于出版时，娜杰日达是不满意的。她不满意的或许还有更多——

“我们这里连一个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所有人都英勇地斗争过，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呢？我可以作证说，我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进行过斗争，人们不过是在竭力躲藏起来。那些没有失去良心的人正是这么做的。要想这么做，也需要真正的勇气。”

娜杰日达从60年代开始撰写这部回忆录，她的回忆录刊发在《塔鲁萨之页》上，这是塔鲁萨这个莫斯科远郊小镇的地下文学刊物，创办人有中国人较熟悉的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的作者。回忆录一共写了84个章节，在1970年传到了西方。

也许是这样的“宽松”让娜杰日达撰写这部回忆录，但也许正好相反，正好是因为这环境仅仅是“宽松”！它的关键词，除了“曼德施塔姆”，我想就是“我作证”。

作为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在那些年里她写的最多的是各种申诉材料，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她是非专业的写作者，但这部作品不仅让她成为了作家，而且是一部一流的散文作品，置身于俄罗斯的文学习忆录传统中，依然是一流的。这有曼德施塔姆的原因，但更多的是这位女性娜杰日达自己的东西。时代与个人紧紧地捆在一起，不论她的初衷如何，时代的秘密就在其中。

和我们熟知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回忆录一样，通过娜杰日达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知道曼德施塔姆的创作，他的诗歌与自身与时代环境的碰触——从评传的角度看，没有人能比她更好地发现曼德施塔姆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了。这既包括曼

德施塔姆早期的诗歌，二十年代与左翼文学观念的不同，也有带来噩运的讽刺诗、最后救命稻草般的颂诗。但最重要的是曼德施塔姆在流放地沃罗涅日“喷发”的那批作品。还有就是让读者从整体性上去把握曼德施塔姆的诗歌。

和“苏联的”文学回忆录最大的不同，是置身在大恐怖时代最为绝望的个体生命体验，以及由此带来的观察与反思。他们所经历的流放是比沙皇时代更为残酷的，生死往往在一瞬间，而最为残酷的，是整个社会生态的改变，高度恐怖与高度噤声。娜杰日达写到的作家友情，正是这种氛围下的点滴。这些人怀着巨大的恐惧，也是怀着巨大的勇气，给予落难者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她和曼德施塔姆终生的好友阿赫玛托娃，而文学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一家的留宿几乎是拿全家生命开玩笑，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关注（但是娜杰日达也展现了曼德施塔姆与帕斯捷尔纳克两位诗人的不同，她对巴别尔的描写尤其值得注意，在她看来，巴别尔是有意识的跟契卡人员打交道，“玩火”），还有她在纺织工厂时工人人们的帮助。

最值得留意的，是她当时的房东，一对工人夫妇，“在那段严酷时期，工人家庭里的谈话要比知识分子们的谈话开诚布公得多”：

两位房东的父辈和祖辈都是工人。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是世代无产者。”她提到那些在沙皇时期曾躲在她家的政治鼓动家们：“他们说的是一套，做出来的是另一套！”夫妻俩都

对那些审判案件极其不满，男主人常常厌恶地把报纸一扔，说：“瞧他们用我们的名义都干出了什么好事！”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是在夺权。”所有这一切都被称作工人阶级专政，这让夫妻俩感到十分愤怒：“他们是用我们这个阶级搞乱你们的脑袋。”……（p391）

可以想见的是，作为新政权的边缘人物，政治上的潜在敌人，曼德施塔姆夫妇在同道那里所受到的冷落屈辱，在昔日朋友那里感受到的世态炎凉，都要比上述例子多得多。比如作协官员们，包括作家法捷耶夫，这位高官在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时，有着极其不光彩的表现（见《同谋》），“我们尚未意识到堕落的规模和程度”。而对另外一位文化高官吉洪诺夫，她说，“吉洪诺夫这个活人也曾变成一个纸叠的人物。纸质的空壳里永远不会含有任何真正价值。”何其犀利、准确而又深刻的标准！

法捷耶夫是在回忆录中值得留意的人物。他是作协领导，让曼德施塔姆走向被捕陷阱（娜杰日达的说法）的是她，后来，当娜杰日达在什克洛夫斯基家留宿时，意外地在电梯里遇到了他，后者有意无意地解释了一下自己为难的处境——这种意味深长的人性展现，绝不仅仅是在苏联。

令人敬佩的是，尽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方有抱怨和控诉的权利，娜杰日达并未滥用这种权利。作为被侮辱的一方，她在追溯这些往事时，虽然对一些人毫不客气，但还是相当克制，没有过火地清算。本书的俄文版序言说：

“她是个畜生，”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常常谈到某个不太体面的人物，“不过我可不是她的法官。”

她有自己的判断，但最为可贵的是她着眼于陈述历史，还原事情的真相。

在这部书里，娜杰日达是怀着巨大的恐惧、巨大的勇气和巨大的反思精神的一个人。尤其是反思力度，从思想上支撑了这部回忆录的价值。对于那些有幸没有被逮捕、被流放的人，娜杰日达看到了某些人的生活“仍几乎是悲剧性的”。而即使对于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权力的政要，娜杰日达同样看得清楚：“他们前往莫斯科购买的不仅是家具，而且也有墓碑，因为他们的洞穴也同样不够深。一些人根据斯大林命令而消失，另一些人则选择自杀。”没有控诉的意思。

娜杰日达关注的重心在诗人丈夫身上：他的创作，他的诗歌，他的理念，他的遭遇——正是流放的经历促使了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去反思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必然是从身边人开始，政治理念与诗人的关系开始，才推及到政权与个人，乃至大清洗是如何发生，才来思考制度起到了何种作用。在她为这段历史所作的证词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她不仅正视写谤诗的曼德施塔姆，也接受写颂诗的曼德施塔姆，但她明确地知道写一首颂诗的曼德施塔姆与更多的写颂诗的文学家、作家、诗人之间的区别。对何以被归为政治贱民的历史成因作出了解释，这就是：二，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的急剧退化，为一种制度所屈服，进而为一种思想所钳制，最终为之服务，

这样的现象引起了她对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的比较，得出人道主义衰落而暴力、专制主义上升的结论。

在不安、恐惧、朝不保夕的逃亡生涯中，娜杰日达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经历的追问。这84章看似没有联系的短章，那些丰富的细节与其说归功于长期背诵丈夫诗句的女性，不如说流亡生涯深刻地打开了一位作家的世界。这些回忆散文一定是经过长期的反思、消化，它们包含了由来、合理性、不合理、未来的疑问。它们这里有“时代的喧嚣”，更有时代的秘密。

众所周知，在娜杰日达晚年，虽然回忆录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但她所期望的，无论是曼德施塔姆的清誉、作品出版，还是社会的进步，都所见甚微。因为整个制度没有改革、没有前进、没有变化。书中有一节写到她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为国家辩护的人，很值得留意，因为他代表着所谓“坚固的中间阶级”，当拥有一些利益之后，如何看待社会的进步，这是个巨大的命题，而很显然不是人人都希望为价值观而改变丰厚的现状。

但她以对两三代苏联人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过去严密布防的效果逐渐在年轻一代中失去了魅力。同时也有更多同道让她关注，比如布罗兹基。流亡是他们共同的宿命，这大概也是布罗兹基关于这对夫妇的评价是那么感同身受、公允和体贴的原因。

在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后，娜杰日达在铁路边的纺织工人村斯特鲁尼诺住下来，因为这里经常会见到运送囚犯的闷罐

车经过：

“我有一个疯狂的念头，即我有朝一日能在闷罐车的车窗（实为一道缝隙）里看见奥·曼的脸庞……”

说这是伟大的文学的感人力量是轻慢的，尽管它是何等的感人！“一切文字，我最爱血泪所写者”，这“最爱”也有些轻慢，它让生者感到自责和愧疚。娜杰日达展现了一位伟大女性的坚强与忍耐，这种力量在这些文字里，这些揭露里，也在这些为文字所略去的冗长时间里。别忘了那些没有写下来的、全部是等待、恐惧、绝望、争吵的时间。娜杰日达的一个反思是：在遭到殴打、踩踏时，是发出哀嚎还是保持蔑视的沉默来回敬刽子手？她的结论是：

“如果身边再也没有剩下任何东西，那就应该发出哀嚎。沉默，则是真正的反人类罪行。”

娜杰日达最让人尊敬的是：她不仅仅发出了哀嚎。❶

明朝宫廷政治那些事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北京，sunjiaoji@gmail.com）

俗话说，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有史家回答说，宜从明史说起。为什么别的朝代不提而偏偏提明朝呢？这是因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发展到明代，各个方面已臻于成熟，最具代表性。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里对明朝的评价就颇高，他用一种近乎仰慕的口吻写道：

“从1368年到1644年的明代是人类历史上政府有序、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在相对和平的二百七十六年内平均人口约为一亿左右……总之，明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以致1644年至1912年在外族的清朝统治时（政治制度）又基本没有改变地保持了二百六七十年。”

然而，古代帝制发展到明朝，虽然表面保持了稳定，国家呈现出一片和乐融融的盛世之景，但华丽的旗袍之下，覆盖的全是跳蚤。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提出的著名论断至今还常常被人提及：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

代而极，用粗疏的道德教条代替了科学的国家治理，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黄仁宇眼里，明朝政治犹如“潜水艇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政治上层文官集团，好比一块大而无当的长面包；底层散乱无序的农民阶层也是一块长面包。这块硕大无朋、随时可散架的制度面包，却是靠尊卑男女老幼的道德勉强维系着。此乃中国封建政治的稳定基础，也恰恰是其潜在的危机。

当然，我不是故意要挑大师的刺，但我总觉得所谓的道德，难免成为肉食者拿来糊弄大众的工具。道德家最擅长的莫过于说一套做一套，人前反三俗，被窝看毛片。道德之下，肯定还藏着什么别的门道。如果确实如黄仁宇所说，剥开明朝“盛世”之皮，底下全是虚浮的道德，那么再进一步剥开道德的皮，底下又将有何物呢？一位名气不太大的业余史家回答说，道德所掩盖的是官场厚黑和权力斗争，并且，他还顺便回

答了费正清所说的明代“政治和社会制度十分稳定”的原因，也恰恰是因为“官场权斗”四字。明代上演的一出又一出官场权力角斗，朝臣们整天忙于党同伐异、搞政治运动，精疲力竭之后，自然没有人再有心思打皇帝宝座的主意。

这位史学家叫温功义，他在《三案始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9月）一书里给读者提了一个醒：谈历史的时候，不要以为问题都到道德为止。恰恰相反，历史上大多数问题，正是从道德开始，顺藤摸瓜往下看，可有好戏瞧呢。温老的观点，大致来说就是：中央政府内的党争表面上看确实有利于权力制衡，稳固皇权，但长期看来，它也为一个政权的覆灭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统天下后最大的心头病就是权高震主的宰相，他为了保全基业，最大手笔的一项就是废宰，把中书省的职能分配给六部，而宰相的职能则被分给了一众阁臣。阁臣们在殿阁里商量的事必须上报皇帝，经由皇帝批准才能执行。这种“制度创新”的确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稳定，但也由此带来了朝廷中的另一大麻烦：由于权力被分散、各部门相互制约，朝臣们抱团结党的风气自此大为盛行，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长期这么搞下来，到了万历年间，朱家王朝的朝廷内已经是派系林立、遮天蔽日的景象了。

再看看这帮朝臣，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看家本领并不是处理政务，而是窝里斗。逮着任何一件事他们都千方百计推给政敌，然后群起骂之，彻底把对方批倒斗臭。颇为



《三案始末》

巧合的是，当朝廷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宫廷狗血剧的时候，皇宫内接连爆发了史上著名的“明末三案”，这一下，可就把明末的宫廷连续剧剧情推向了高潮。

所谓“三案”，原是指“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个宫廷案件。就事论事来看，三案并无可影响明朝政治走向的力量。简言之，“梃击案”是指万历四十三年，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后被捕一事。“红丸案”则是万历皇帝的儿子光宗病重时，李可灼进献红丸仙丹，光宗服后暴毙的案件。所谓“移宫案”，指光宗死后，妃子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企图居乾清宫，挟皇长子自重，后被逼移出乾清宫之事。它们看似各不相干，但在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政府高层眼里，每一个案件都是大可做文章的政治资本。

拿皇族那点家务事来做政治文章，首先就得搬出“道德”两字。道德是一根棍子，忠奸是一顶帽子，谁被扣了帽，就会惨遭政敌摠住一顿痛打。道德在现实中的化身，便是封建礼法。上到庙堂，下至闺房，明朝所有的事情都要被道德礼法管束起来。当中，也包括了皇帝“下半身”的那点事。万历皇帝极宠爱郑贵妃，却不小心和宫女发生了一夜情，生下长子朱常洛。万历并不喜欢那个意外获得的长子，他更想立郑贵妃生的第三子朱常洵为王储，但他这点心思很快被朝臣洞悉，狗血剧情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自古立幼废长不合于礼法，万历的决定亦不例外。朝臣听闻后哄然，不少人拿出了祖宗的道德规劝皇帝。户科给事姜应麟上奏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无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跪求，“伏请俯察輿情，收还成命”。心太软的万历皇帝见拗不过，只好使用拖延战术，对立储的时间一拖再拖，拖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长洛年届二十，朱常洵也年至十六，还迟迟没有结婚。眼看皇子成了“剩男”，万历终于妥协，册封皇长子为太子。

但故事到此远远未结束，因为这时“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便是以是否主张立储，作为忠奸正邪的辨别”。主张立长子的传统派、同情郑贵妃的投机派、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以立储为基础，搬弄是非，大做文章，搅得大明朝的后院鸡犬不宁。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三案”源头上在于党争，党争又是由立储的问题所引发，而立储的争

执得以发生，直接原因还在于皇帝没能管住自己的下半身。——但皇帝有义务管住自己的下半身吗？当然没有，全天下的女人理论上都是属于他的，爱谁谁。顺一遍下来，党争问题根本就是无解。

当手拿凶器的张差被法医鉴定为精神病时，拥护太子一派就有人说，这是心狠手辣的郑贵妃派人要杀太子；当没做几天皇帝的朱常洛吃错药暴毙时，又有人散布阴谋论说，郑家有人谋害了皇上……总之是谣言四起，辟谣也四起，人心浮动。满朝文武都在忙着扮演大型宫廷真人秀，没心思搞“实干兴邦”的动作了。而高高在上的皇帝们呢，则是新褙裤换个破口袋，一代不如一代。“明代的皇帝，除去朱元璋和朱棣活得较长之外，寿数都不算高，大多是才过中年便下世了”。有了党争、攻讦不断的朝廷，有了分权的制度，朱家的皇帝们自然可以高枕无忧，玩女人、玩银子、炼丹、修道……反正什么都玩，玩得骷髅形骸、精尽人亡，就是死都不理朝政。国家至此，可以歇逼矣。

温功义总结道：“三案都属于宫廷案件。在元凶已获，罪人斯得，原已可算了结。但由每一案件自发生以至暂结，都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关系，盘根错节，很难了断，以至每案虽结，却都不能彻底……这是由于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臣之间互相勾结，渐成门户。”这道破了中国宫廷政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锅六必居酱菜，糊成一片。皇帝腌好菜，群臣放作料，再用道德、党争的棍儿一搅和，成就了大明梦。Q

政治心理学时代的到来



特约撰稿人 吴强 (qiangwu.de@gmail.com)

当碌碌无为的一代技术官僚退出，闪耀着光环的政客们登上政治舞台，一年之后，做出了一些象征性让步，其余的都被锁死，我们知道，对这样的体制做任何有关民主转型、或者政党宪政的分析都无异与虎谋皮，还是谈谈首脑们的政治心理或者政治性格吧。

就像中国政治学界现在的主流研究之一是做治理或者协商，他们总觉得无论民主或非民主、转型前或后，总是需要治理的、总是要协商的；当威权体制开始固化，总统制俨然成形，那么，从西方对政客特别是总统的政治心理学研究来观察中国政治，便再顺理成章不过了，也是剩下几乎唯一有趣的问题。

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例，这位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能够充分利用广播和收音机的传播效果，以娓娓道来的“炉边谈话”，给处在大萧条的美国社会注入了温馨的暖意；也能发挥他的高超平衡

技巧，没有规划、近乎随意却行云流水地领导了“百日新政”的立法工作。但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笔下(《总统风格——从罗斯福到奥巴马》，李永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由于成长期深受母亲严格管理的影响，形成了感性思维强而抽象思维弱的性格，也就是情商较高，常常凭着直觉而不是分析决定问题，缺乏政治原则的把握，缺乏政治远见，常常在大杂烩一般的政策箩筐里充斥原则上相互矛盾的问题，却对之毫无识别能力，其白宫组织也堪称杂乱无章，尽管这样做也被誉为善于平衡，尽管他在关键时期做出了新政和开战这两个历史性的决定。

类似的美国总统不乏其人，比尔·克林顿算一个，巴拉克·奥巴马也算，他们都在单亲家庭长大，受母亲或者女性的性格影响远远大于父亲，以至于到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这种性格养成所特有的“选择性撒谎”

或者“选择性坦白”表现得尤为突出。显然,这种针对母系影响的政治心理分析能够解释克林顿在任期间本应取得更高成就却未能成就,也能解释奥巴马如何因为从小不属于白人和黑人两个群体而产生的认知障碍如何演变为他鲜明的政治平衡风格。奥巴马1995年出版了《父亲梦想》一书,把自己的社会工作和政治理想巧妙地缺失父爱投射到种族政治,赢得了美国公众的注意。他在法学院求学期间,就微妙地与两个对立学术派别保持距离,才获得了《哈佛法律评论》第一位黑人主编的位置,即使在他执教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期间,他也一开始就与追求终身教职的学术生涯有意保持着距离,继续他的社运工作。成为美国总统后,这种包容多元的风格更为明显,他在外交领域更善于运用灵活、平衡的“巧实力”,而非金刀快马硬上弓。

有趣的是,中国的新领袖似乎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强烈的改革情怀,同时具备高超的政治平衡技巧。在他政治性格的形成期,同样忍受着父爱的缺失,面临红卫兵与“黑五类”的认同冲突,一次次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政治运动高潮的红太阳则成为他所属的一代红卫兵心目中的父亲。加之毕生都在母亲的感情和介入下,我们可以发现他身上有着强烈的政治情感表示:对足球有着不同寻常的爱好,在驻墨使馆公开抱怨不输出革命却屡受干预,在指挥国庆庆典时临时增加纪念方阵,对待互联网的潜在挑战不惜以两个“大患”来形容等等。

当然,关键是他作为红卫兵一代的心理劫持和自身经历的认同冲突,我们可以推



《总统风格——从罗斯福到奥巴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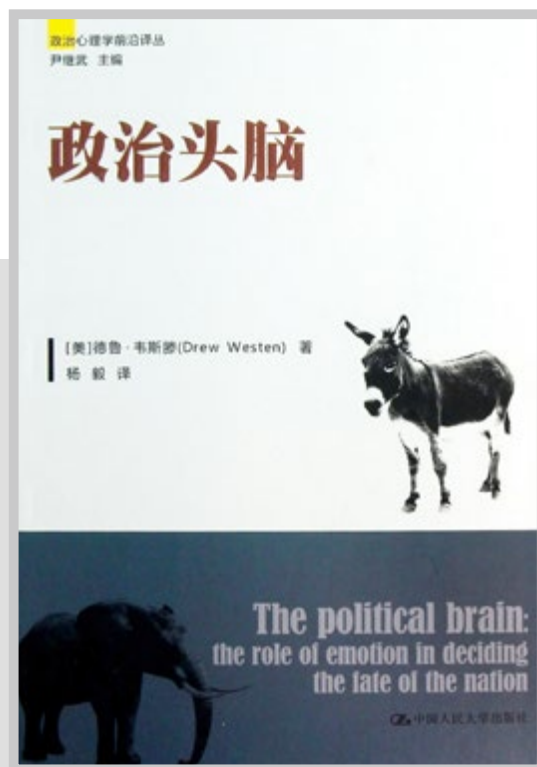
测他内心浓厚的毛主义情结,对他身为“红二代”产生的强烈使命召唤感。可能并无对毛主义和开放社会与市场经济的深刻认识,纯粹只为联结两个三十年,而驱动他将巩固政权作为首要任务。而且,既有着相比保守技术官僚而言更为强烈的改革欲望,又愿意保持平衡,拒绝所谓邪路 and 老路。

更重要的,母系因素以及作为“工农兵学员”而造成的抽象思维训练的缺陷,可能导致他的认知与情感障碍,从不理解甚至害怕“大词”和“公众”发展到执政路线的大幅变化:一方面常常在内部讲话场合以各种小故事开场,并不掩盖个人好恶,包括对足球的热爱,表达方式与传统官场截然不同,非常性情,但是同时难以察觉自己对宪政前后矛盾的立场,在一揽子政策中,比如六十条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作为一种经济让步与政治压缩即经右政左之间的潜在紧张;另

一方面,更习惯于小圈子政治,害怕来自公众甚至对立面的潜在挑战与威胁,其结果之一便是乐于红二代内部的交往,乐于在庄园与美国总统见面、建立私人关系,而不是僵硬的、制度化的集体领导体制,以及甚至可能因此近乎政变式地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安全小内阁”。

当然,政治心理不只是关于政客的政治性格,还包括如何对待或者引导公众的问题,这也是民主政治围绕党派竞选的关键。德鲁·韦斯特(Drew Western)的《政治头脑》(杨毅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给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政治心理分析,即领袖和党派如何影响、操纵公众的心理。按照韦斯特的解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俨然一个是长期打情感牌,联结大资本和民粹公众,另一个则是重视理性、数据和事实的中产阶级政党。里根和小布什是共和党中善于与公众交流、竞选中成功进行情感诉求的行家,而民主党的戈尔则属天然呆,只会谈数据和路线。

毕竟,有关研究一再证实,在面对意识形态、价值观、候选人形象等选项,大多数选民往往最后才考虑跟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而情感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快捷机制,在政治中发挥着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作用。对民主的选举政治如此,对我研究的社会运动也如此,对一个被动转型的非民主体制来说,情感可能同样是公众最容易被操纵和说服的机制。那么,以家国、孝悌、祥和、满足为主题的中国梦,便不失为一种消解他们



《政治头脑》

作为唯一反抗手段的愤怒的终极方案。反正,即使知识分子或者意识形态部门提出什么新旧理论或者概念,大概都很难被新领导人所理解,远不如“梦”这样的标语通俗易懂,容易联结起人民和领袖。无论是不知道“爸爸去哪儿”、在过度情感浇灌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还是“红太阳”照耀下的上一代红卫兵们。他们之间似乎更乐于使用鞑靼人的“大大”相互称呼。

简言之,政治心理学是一个更为科学、普遍的研究方法,既是有关领袖性格和执政路线的,也是有关大众心理和政治传播的。在其他分析工具阙如、政治竞争实践滞后的情况下,传统的揣摩上意和小道消息的政治算命方式或许可以休矣,这标志着一个政治心理学时代的到来。Q

周恩来的留东岁月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周恩来在日本名气极大，朝野上下，粉丝众多，历来被视为蒋介石、戴季陶一流的“亲日派”。而这一切盖源于周“人在东京”的一段日子。

1917年9月，从南开学校毕业的周恩来，从同学、师友处筹措了一笔川资，从天津乘船赴日留学，时年19岁。行前，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并写了一首七言诗励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作为江浙人，周恩来与周作人一样，对东瀛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很适应，全无“违和感”。他在当年12月致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说：“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吾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日本风俗，不见优美，好在谨言慎行，无不可

居之地。倭国虽小，安分克己，尚无不合式也。”为便于饮食，国人咸住中国馆，而周则下宿日馆，住在神田一升家具店的二楼，

“较中馆清静，无喧哗声，便于用功”。10月，入位于神田区仲猿町七番地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参加官费考试。按照当时中日两国政府间协定，中国留学生只要考上东京高等师范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学府，便可享受中国政府的官费待遇，基本衣食无忧。

对周青年来说，在南开学校时，已经学过数理化等课程，且均是英文教材，应问题不大，但来到日本后，则面临如何用日语来表达所学知识的难题。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提高日语水平，以应对官费考试。周恩来每日上课，去青年会阅报，参加同乡和南开校友的聚会，忙得不亦乐乎。在东京，他还重新“发现”了国内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经常从友人处借回去读。翌年1月8日，接堂弟来信，得知淮安的叔父周贻奎在贫

病中去世的消息，“哀痛异常，不知所以”。升学的压力，身世的感伤，前途的漂泊不定，周青年的苦闷可想而知。他立志发奋苦读，考取官费。“随后搬到一租金低廉的住处，改包饭为零买，每天废止朝食，以节省开支。”（《周恩来年谱》）

但随着考期的临近，周恩来内心的焦虑与日俱增。他在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而与此同时，他又痛感观察日本社会的必要性：

“人要是把精神放在是处，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2月4日日记）

时光如梭。1918年3月4日至6日，东京高等师范入试如期举行，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科，外加口试。周青年落第。“此后，为准备七月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给自己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周恩来年谱》）

其间，周青年曾加入旅日中国留学生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发表了关于“新”的入会演讲，令同胞学子耳目一新。他指出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



而“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6月初，“重新开始温习功课，全力以赴准备考试”。7月2日至3日，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入试，日文再次挂科而名落孙山。他在随后的日记中写道：“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取官文学校，此羞终不可洗。”7月28日，周青年经釜山回天津探亲，9月4日，又回到东京，准备以厉再战。刚好这时，从国内传来母校南开开设大学部，南开毕业生可免试升大学的消息。于是，周青年当即决定调转航向，回国就学。

回头来看，周恩来作为五四时期的一介知青，挣扎于对救国道路的摸索和对个人

前途的焦虑的夹缝中，所面对的压力和矛盾其实与今天出身于农村或地方小县城，来北上广或国外打拼的80后、90后颇有相似之处。革命与国族的前途固然顶重要，但个人的安身立命却也不是次要问题——不仅不次要，有时还须优先考量。否则一步糗棋，就可能满盘皆输，铸成终生“屌丝化”的大错，岂是闹着玩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百年前“人在东京”的周青年最终其实是做了退而求其次的现实性选择，而今天绝大多数80后、90后们，怕也只有向现实妥协之一途。

1919年4月5日，周恩来经京都踏上归途。在京都小作停留，游览了郊外的岚山，写下了《雨中岚山》等三首新诗：“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

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在日本接触了河上肇、幸德秋水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又刚刚调整了人生目标的周青年，这时对自身前途等问题的思考，已经有种“辩证法”的味道。

国人常为尊者讳，迷信伟人、名人有时到了不惜穿凿附会的程度，其实很可笑，譬如说周恩来是罕见的语言天才，精通四国外语（英法日俄）云云。据历史学者陈明远考证，“周恩来一直没有完全学会日语。后来的外交文献也表明：周恩来并不掌握日语会话。顺便提一句：周恩来的英语可以说是相当棒，但他的法语和俄语水平，也并不是那么非常高的。”（陈明远：《周恩来留学日本遭遇的挫折》）

这个时代的“生”与“死”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上海胶州路火灾一晃已三年。

死者已矣，生者如斯。但当年那一幕幕惨烈景象却仍历历在目，火宅焦灼，死者无助，观者动容。三年后来回看这场“火宅之难”，却发现仍有住户安顿事宜未得最终解决。当然，对于很多人而言，回忆那一场灾难，或许更多的是对逝者的感慨唏嘘，毕竟当年扑面而来的劫难悲情业已沉淀为各自的记忆，成为我们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如今回想，当年的自发悼念活动，不仅仅是生者对于逝者的凭吊，而且是参与者在这样一个场景里共同体验面对“死亡”的情绪，恐惧、愤怒、悲伤、希望等等。因此，凭悼绝非只是表达生者的悲情，而且还寄寓了逝者所呈现的疑问：同为人，为何会有这样的命运差别，我们又该如何面对生死的轮盘？

将生死比喻为“轮盘”，或许是因为在一般人的意识里，死亡多少有点类似赌博，

中国人常言，“富贵在天，生死由命”。无法预料明天，故死亡降临全凭命运安排。稍有不甘心者，也非效仿贝多芬那般“扼住命运的咽喉”，而是祈求术士泄露一丝天机。当然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其实并无太大差异，占星术在西方世界的流行，大概也类似东方占卜术的命运与地位，只是这些命运的神秘测算术因受到主流科学观的压制，多少只有一些彰而不显的意味。

如何面对死亡，大概医生最有发言权。最近在TED台北分场有一场精彩的演讲，是由台湾著名重症医师柯文哲来讨论“生死”问题，柯医师早年最早在台湾引入叶克膜技术（即暂时替代患者心肺功能的设备），成为一时美谈。柯医师在回顾一生的医疗经历时，常会觉得医生对于生死问题其实也一样茫然无助，与常人并无太大差别。所以他说，一旦当了解医术并不能解决生死的问题，他才明白，或许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去正视“死亡”，才有可能了解“活着”的意涵。

不过儒门常说，“未知生，焉知死？”在他们看来，“死亡”因为不可知，所以只需关注“生”，这也使得在儒家文化中，一直缺乏对于“死亡”问题的深入看法。而依佛家而论，在佛教的十二因缘观中，其中一个重要法则就是“生缘老死”，意即谓，存在“死”乃是因有“生”之故，所以要思考“死”之因，不是聚焦在“死”，而是须反过来探讨我们如何“生”。但谈论“生”，许多人马上会遭遇与“死亡”同样的认知盲区，死亡之后的情形我们不可知，出生之前不同样如此？父母孕我生我，与我何干？我们的生命形态存在于“生死之间”，之前难追难抉择，之后难测难思议，如此说来，这条路岂不是死胡同？

或许这样的问题还是得从个人经验谈起。三岁以前的所思所想大概一般是很难被清晰回忆的。不过也有特例，比如我就对两岁左右时的某些场景印象深刻。在记忆

中的某日午后，还在勉强学步的我独坐房边阳台，看着院内一帮小孩呼啸来往，嬉戏玩耍，当时还在学步的我居然升起一种极为奇异的体验，似乎自己是在用一种年长者的眼光来打量这一番场景，并不是那种初降临于此的新生儿那样充满好奇新鲜，反而带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意味。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反复忆起这样一幕场景和当时的感受，但却无法寻找到合理的解释。后来偶尔读到20世纪的著名政治哲学沃格林的一本较少被关注的书——《回忆》（Amnesia），发现沃格林为了弄清为何自己会有一些与同时代许多主流哲学家迥然不同的“意识体验”，于是试图从童年经验的回忆中找到原因，但显然，他的“回忆”是零散与片段的，根本无法完整回忆昔日所思所感，我们的“记忆”在这一生中不断地散失、湮没。那么问题接踵而至，我们虽然无法完整回忆起此生的



经验，但至少可以确认哪一种经验是否确实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事实上，或在梦中，或在清醒状态下，我们常会不由自主地浮现一些从未有过的经验和印象，那么，这些“幻想”又来自何处？难道只是我们意识创造的产物？

问题到这里，已经略微触碰到今天西方意识哲学、宗教、脑科学等学科的跨界焦点了，当然这并不是这篇文章所处理的核心问题。不过这或多或少说明，今天的人对于“意识”这样一个了解生命最为重要的关键部分，却仍然不过是如同幼稚园水平一般而言。

对于个人而言，在那之后，另外一个疑惑油然而生：“我”是什么？如果“我”只是这个意识和生理的结合体，这样的“我”为何没有生活在过去，也没有降生于未来，而是恰好在这个时代？

好，如果当我们的思维中出现了关于这一期生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概念，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想象和理解许多文明所反复讨论的生命流转说，如在早期印度文明中孕生，而同样被佛教、耆那教肯定的生命轮回说。在轮回说里，他们都认为，每一期的生命其实都只不过是无数次轮回中的片段经历而已，而我们每一次的“生”，其实必然意味着前一段生命形态的“死”，如此生生不息，而同样的，死亡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它的脚步。

无论是印度教、佛教、耆那教，还是中国的道教，他们都从未告诉我们，生命是断灭的深渊，只如昙花一般闪现一次，相反告诉我们，生命是以不同的形态在不断的轮回或演进，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面对生命流转的看法不同，而且对于生命轮回解脱的理解与实践方式上各有差异而已。



如果你愿意暂时尝试去接受这样一种对于生命的诠释，那么是否会发现，我们内心里对于“死亡”的执着纠结多少会得到某些纾慰，对于亡者的祭奠行为或许也开始具有一些不一样的意涵。

让我们再度回到三年前的胶州路。在当时的悼念过程中，我看到有人鞠躬鲜花，有人磕头烧香祭拜，有人合掌诵经超度，有人演奏音乐寄托哀思。当被卷入一场面对“死亡”的灾难时，我们会被逼迫着去思考“死亡”的意义，例如，我们要如何去面对“死者”，该以何等的“仪式”去宽慰生者、告祭亡灵。而这些观念和

仪式其实反过来又会要求我们认真思考这个时代中国人对于“生”与“死”的种种看法。

在佛教中通常有一种说法，任何让生者看到“苦、空、无常”与“轮回”真相的死亡，都是“死者”对于我们的某种示现，因为那让我们深入地了解了生命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死者”的不幸却启发和利益了“生者”，让后者可以去寻找安顿生命的解脱之道。而那些逝者们，会被佛教徒看作为“菩萨”的化身。

或许，那些逝者们，就是让我们得以真切体验“生死”真相的“菩萨”吧。Q

如何破解玲珑棋局



特约撰稿人 严飞（美国·旧金山 fei.yan@green.oxon.org）

“和谐相依，方成棋局”，这是吴清源对围棋的观点。他偏重于用一种超乎自我的哲学观念看待围棋，他曾经这么说过：“胜负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不是想胜就能胜，这就是围棋。因此十局战从一开始我想的就是让自己委身于围棋的流势，任其漂流，不管止于何处。”这是吴清源下棋；“胜固欣然败亦喜”，这是苏东坡下棋；“金庸又曾对围棋着迷，但段数不高，已故名作家司马长风，称他为‘棋坛闻人’，可知棋艺平平”，这是金庸下棋。

金庸对吴清源的评价很高，在《吴清源自传序》中，他被朋友问到古今中外最佩服的人是谁时，金庸冲口而出的答复到：“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最佩服的原因一则是“至于吴清源先生，自然是由于我喜爱围棋，因而对他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吴清源的围棋下到了一个“平常心”的境界——“到了这境界，奕棋非但不是小道，而是心灵修为的大

道了”。金庸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心目中围棋最高的境界是）古代士大夫接受中国文化的精华，强调的不是技巧而是境界的高低。好比我们推崇文人画，不推崇画匠，是因为后者只有技巧而没有内容。”

棋如人生，人生如小说。在金庸的十五部小说里，涉及到围棋的有多部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琴棋书画、五行八卦无所不通的黄药师，《书剑恩仇录》中以围棋子为武器的陈家洛。这两部作品中均没有出现两人对弈的场景，围棋只是扮演了一个道具起了点缀的作用，具体描写围棋的则有《碧血剑》、《笑傲江湖》和《天龙八部》，由此塑造了小说中的围棋文化。

写于1956年的《碧血剑》是金庸的第二部小说，在第三回，描写了袁承志跟随木桑道人学棋的场景。金庸曾经自比为木桑道人，爱好下棋但棋艺不高。“千变万劫棋国手”是木桑道人自封的称号，棋瘾极大，



又好争一个胜负，先跟穆人清下，穆人清性情淡泊，木桑和他下棋觉得搏杀不烈，不大过瘾。此时袁承志显露出围棋的天赋和悟性，从受九子进步到饶二子，加上年少气盛，要在围棋上千方百计的战胜木桑道人。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棋逢对手の木桑道人和袁承志这一老一小，终日废寝忘食的在楸枰上打交道。由于《碧血剑》是金庸早期的武侠小说，金庸自身对围棋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平常心”的境界，所以在书中他指出：“围棋最重得失，一子一地之争，必须计算清楚，毫不放松，才可得胜，如老是存着‘胜固欣然败亦喜’的心意下棋，作为陶情冶性，消遣畅怀，固无不可，不过定是‘欣然’的时候少，而‘败喜’的时候多了。”

对围棋描写最多且最为精彩的一部书当推《天龙八部》，书中有两处写到了围棋：一处是段誉被困万劫谷，黄眉僧前去

救人为段延庆所阻，二人斗棋斗力，棋到中盘，黄眉僧已经不支，好在有吃了阴阳合和散的段公子支招，两个徒弟做信使，又多支撑了几十手，才现败象。金庸在这里指出：“武学之士修习内功，须得绝无杂念，所谓返照空明，物我两忘，但下棋却是着着争先，一局棋三百六十一路，每一路均须想到，当真是锱铢必较，务须计算精确。这两者互为矛盾，大相凿枘。”这与《碧血剑》中的围棋最重得失相比，已然前进一步。如何将棋心和禅心结合在一起，是相互矛盾又是相互契合，这在第二处聪辨先生苏星河广发英雄贴，邀人前往共解“玲珑棋局”时得到了诠释。

来解“玲珑棋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大理王子，围棋高手，但是为情所困，一个情痴是不能下好围棋的；一个俗世翩翩佳公子，姑苏慕容，但是为名利所陷，一

一个名利心太重的人是下不好围棋的；一个四大恶人之首，凶神恶煞，但是为恨所阻，一个老想着报仇的人也是下不好围棋的。金庸自评道：“这个玲珑变幻百端，因人而施，爱财者因贪失误，易怒者由愤坏事。段誉之败，在于爱心太重，不肯弃子；慕容复之失，由于执着权势，勇于弃子，却说什么也不肯失势。段延庆生平第一恨事，乃是残废之后，不得不抛开本门正宗武功，改习旁门左道的邪术，一到全神贯注之时，外魔入侵，竟尔心神荡漾，难以自制。”

玲珑之局，关键之道是弃子，白棋需先挤死自己一大块，天地宽敞后才能腾挪自如，不必进退维谷，这在围棋上叫做“倒脱靴”。在《碧血剑》中，袁承志也曾用过这招，“把边角全部放弃，尽占中央腹地”，结果连赢木桑道人两局。所以这个玲珑棋局，倘若换成必争胜负的木桑道人去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虚竹棋术不高，但对禅的参透悟性甚高，金庸写虚竹，其实也是将自己对佛学的理解加入其中，他引用了《法句经》：“胜者生怨，负则自鄙。去胜负心，无诤自安。”对此金庸也给了我们通俗的解释：“学武讲究胜败，下棋也讲究胜败，恰和禅定之理相反，因此不论学武下棋，均须无胜败心。念经、吃饭、行路之时，无胜败心极易，比武、下棋之时无胜败心极难。倘若在比武、下棋之时能无胜败心，那便近道了。”棋心和禅心之中由此找到了一个结合点，这种结合通过虚竹的师傅玄难之口道出：“这局棋本来纠缠于得失胜败之中，以致无可破解，虚竹这一着不着意于生死，更不着意于胜败，反而勘破了生死，得到解脱。”这个和吴清源的“与其说围棋是竞争

和胜负，不如说围棋是和谐”是一个道理，所以金庸推崇吴清源，道理就在这里。

“在广阔的世界中谋求和谐”，这是吴清源的想法，同时也应该是金庸向往的一种境界。如果不抛开围棋即是胜负的既成概念，如果没有在浩渺时空中遨游的胸怀，这是无论如何也考虑不到的。因此，可以说金庸是在自己虚构的小说世界中谋求理想和谐。天下是否真有玲珑棋局，这个并不重要。玲珑也只是围棋无限变化中的一种，从理论上说，棋盘格数是361，那么其变化应该是有限的，即： $361 \times 360 \times 359 \times \dots \times 3 \times 2 \times 1$ ，从361开始顺序相乘所得数目（361的阶乘）。同样照此推理，人们所能得出的棋谱数，就应该是768位数，然而不管我们如何能耐也不可能完全窥知这个围棋盘上的所有变化。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达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境界，只能寄希望于小说中的虚拟世界，虚竹的出现，正是自然地契合满足了小说读者的这种可望而不可企及之心理。

然而虚竹最后也从一个心无外物的和尚步入江湖，进入江湖的人士还可以没有牵挂吗？所以，我们大可以大胆揣测，此时的虚竹倘若再有一局这样的玲珑棋局也是难以解开的。所以，在后期沉浸佛学的金庸，其笔下的武侠人士，多半是以归隐江湖做结的。

《笑傲江湖》中的梅庄四友就是在西湖湖畔隐居，享受琴棋书画的隐士。其中的黑白子是真真正正的棋痴了，同木桑道长一样，弃去原先的兵器而改用磁铁棋盘为兵器，黑白棋子为暗器。其居室除了一张刻着纵横十九

道棋路的石几、两只软椅之外，空荡荡的一无所有。他年迈之后头发极黑皮肤极白，黑白分明，整个一个人都处于黑白世界之中。《笑傲江湖》里还有一个人，棋艺也是十分的高明，此人就是给黑白子摆《呕血谱》的向问天。书中并没有正面地描写向问天的棋力如何，但见他熟练的摆出棋谱，让黑白子瞧的额头汗水涔涔而下，想必棋力当在黑白子之上。这里。金庸又借着向问天将下棋的境界道出：

“好比下棋，力斗搏杀，那是第九流的棋品，一二品的高棋却是入神坐照。”这种一二品的高棋该是指的吴清源下棋吧，通幽、具体、坐照、入神的确是最好的写照。

金庸通过对小说中围棋的描述，展现了他的思想轨迹，从最初的必争胜负到其后的不着意于生死胜败，再到最后的入神坐照，都应着吴清源的那句“和谐相依，方成棋局”。

隐匿江湖，心中无一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棋力方有长进，玲珑棋局方能解开。只是这种隐匿毕竟消极，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也讨论了隐士的问题，武侠小说写的是人性，追求的是个性的解放，这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可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么，玲珑棋局又由谁来解呢？

白居易有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通俗的说就是隐于山野僻壤的不过为小隐，居于朝廷与市肆又清虚隐逸的才为大隐士。换种解释就是说即便虚竹后来入了江湖，只要做成一位大隐士，玲珑棋局依然可破。所谓“会心处不必在远”，散漫而疏放，心凝而形释，大概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吧。Q



那只怪兽又来了



特约观察员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一群六到十二岁的孩子,因为飞机失事而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荒岛上生存条件很差,然而最大的生存威胁却来自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自身:随着人性中恶的膨胀,文明、理性、道德与秩序迅速分崩离析,这群孩子们立即从起初的民主和谐陷入互相残杀的局面,代表着兽性、非理性与野蛮的一派迅速击败了代表着人性、理性与文明的一派。这是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里故事,借助小孩子的天真来探讨人性中的恶。1983年,戈尔丁因其小说“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获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吉米·基梅尔的“蝇王”版脱口秀却没有威廉·戈尔丁如此幸运。10月16日,美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吉米·基梅尔在脱口秀节目“吉米鸡毛秀”中,邀请了4名小孩组成“儿童圆桌会议”来讨论“政治”问题,以此来讽刺政府倒闭期间的美国国会

议员像一群小孩子。其中讨论的一个“政治”问题是,美国该如何偿还所欠中国的高额债务。其中一位6岁男孩的意见是:“绕到地球另一边,杀掉每一个中国人。”随即,吉米说:“杀掉每一个中国人?ok,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之后,他问其中一个孩子:“如果你欠一个人的钱,你应该还给他吗?”小孩回答说:“Never”。接着,他又问所有的小孩:“我们这个国家应该还钱吗?”所有的小孩都回答说:“Yes”。因为6岁男孩也回答Yes,基梅尔不忘调侃地说了一句:“你刚才不是还说要杀光中国人来着?”接着,他又问:“我们应该允许中国人活着吗?”除开那位6岁男童说“No”之外,其他三位孩子都回到:“Yes”。为此,孩子们对最后一个问题进行了短暂的讨论。最后,吉米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讨论:“这是一个有趣的儿童圆桌会议版本——《蝇王》版本。

(this has been an interesting edition



of Kid's Table -- The Lord of the Flies edition。)”孩子们开始吃软糖。整个节目长3分44秒。

我把这3分44秒看了又看，显然，这期节目的寓意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吉米一句“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会触痛许多人的神经。首先，“interesting”在美语环境中，尤其在口语中，经常被用作是委婉语，貌似褒义，实质多不同意。其次，若将吉米两次说的“interesting”联系起来看，“interesting”的意思更明显了，那就是“蝇王”。在小说《蝇王The Lord of the Flies》中，蝇王是野蛮一派的孩子们献给“怪兽”的祭品——一个插在棍子上的猪头。这个猪头生满苍蝇，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蝇王。蝇王实际上是恶魔撒旦“Beelzebub”名字的意思，寓意人性的

黑暗面。因此，当看到许多人为吉米的“种族歧视言论”进行抗议时，我着实吃惊了。首先，我没有在他的“interesting”中读到“种族歧视”的意思。其次，节目中唯一的大人吉米实际上至少两次引导孩子们思考“欠债应不应该还钱”这个问题，若是明白“蝇王”的意思，吉米的褒贬其实不言而喻。最后，若是再加上此节目的背景，这个脱口秀可以说好得令我惊讶，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政治、人性两个这么复杂的问题说得如此深入浅出，一般大学教授也难以做到。

10月24日，汉学家林培瑞教授在哈佛大学与一群学生谈“21世纪做中国人的含义”。林培瑞教授提出三个问题，如何看待西方霸权，或是说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的不平衡；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国政治思

想；海外的中国人该如何做。然后，林培瑞举了两位他所认识的中国人，他认为这两位中国人在这三个问题上处理的很好，其中一位便是历史学者余英时。其原因也是三条：第一，对西方不需要低头也不需要抬头；第二，民族主义是心虚的表现；第三，余英时在表达以上两点时，不慌不忙，非常有信心。然而，也正是在这个座谈会上，一位学生对吉米的行为表示愤怒，甚至在座谈会后，还依然义愤填膺对我说：“已经有一万多人在白宫请愿书上签名表示抗议了，这关系到尊严，你懂吗？”

在小说《蝇王》中，孩子们都非常恐惧“怪兽”，甚至还为“怪兽”献祭。但其中有一位爱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真相的孩子西蒙，意识到所谓的“怪兽”其实是孩子们自身。于是，他独自去丛林中寻找“怪兽”的真相。在半路上，他与蝇王“意识对话”。蝇王告诉他，“怪兽”没在别处，正藏在孩子们的内心。在作者戈尔丁看来，社会的缺陷要归结为人性的缺陷，他的作品便是要人正视“人自身的残酷和贪欲的可悲事实”，以医治“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无知”。

我不知道座谈会上的那位学生是否听了3分44秒的完整节目，是否听懂了《蝇王》的意思，但我所看到的所有的中文媒体报道，都没有交代吉米言论的背景，既没有提这期节目的初衷（前十秒便说得很清楚），也没有提到吉米所说的最关键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有趣的儿童圆桌会议版本——《蝇王》版本。”当然，更没有解释什么是《蝇王》，只是简单挑出一句“杀死所有中国人”，于是，气势汹汹的愤怒像一只怪兽

似的冲了出来，这才真正让人害怕。

小说中，独立思考的西蒙便是被当作“怪兽”被失去理性的野蛮的孩子们活活打死的，文明的秩序也正是被这种非理性的野蛮一点点摧毁的。Q



一个熊孩子引发的罗生门

DISCUSSION



特约观察员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fangyizhu@gmail.com）

在自由社会里，如果说媒体是屎壳郎的话，那么政府显然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每一次政府出糗都会引发媒体的狂欢。而上个月美国政府关门事件显然是上佳的原材料，不吐槽就不是媒体人。于是吉米·基梅尔（Jimmy Kimmel）在10月的一期节目里问一群孩子：我们欠了中国人钱，怎么办？一个熊孩子说：绕到地球另一面，杀光中国人。基梅尔说：“好吧，这个点子有意思。”（Ok, 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注：英语中的interesting取决于语境和语气，大部分时候是一种敷衍。）然后孩子们接着童言无忌了一阵，最后基梅尔总结说：“好了，这次的儿童圆桌是一个有趣的版本——蝇王版。”（Well, this has been an interesting edition of Kid's Table -- The Lord of the Flies edition.）《蝇王》在美国不是什么高深著作，属于中学生普及读物。蝇王版几个字话音刚落，观众席上哄笑声起。在这哄笑声中，观众席上的大人们

是否有仔细品味他们从小熟知的典故，严肃思考蝇王所揭示的、深藏在儿童心中的人性之恶，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档节目并非现场直播，一贯是录播剪辑而成的。ABC（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并未把这一节剪掉，而是让它播出了，于是华人圈子里舆论大哗。

要解读这个事件，不能脱离大的社会背景，否则也是一种断章取义。这件事的发生和发展，都跟美国的种族现状和亚裔在美国的微妙地位有关，拿“集体主义”、“爱国”或“民族心”去概括，其实不适当。

（一）政治正确

此事最重要的社会背景，是美国的种族状况。美国的种族问题非常复杂，虽然名义上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其中激流暗涌，文

章多多。媒体和政治家都爱种族牌，事实上，很多成功的政治家往往是种族牌的高手，这当然也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和非裔/西裔群体的投票方式决定的，不打种族牌的政治家，只好打酱油去。媒体为了显示自己的高尚立场，在种族问题上是不愿犯错的，特别是自由派媒体甚至有明显的讨好非裔/西裔的倾向。

这一切的大背景之下，形成了“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个种族的雷区，谁都不敢随意跨越。种族玩笑是不能随便开的，与种族有关的词语也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否则轻则被要求道歉，重则丢名誉，丢工作。

这样的雷区还包括残疾、性别和性取向等。虽然政治正确现已逐渐变成贬义词，但笔者认为，这些雷区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是好事，只要联想一下国人歧视其他有色人种、女性、年龄、地域、性取向、容貌，不但想在心里而且敢于挂在嘴边，有的甚至敢写在成文的政策里，甚至大大方方上春晚，笔者就为同胞们坦荡荡的刻薄劲儿喝一声采。任何尊重，守好嘴巴是最基本的，然后才可以谈其他——口头都不尊重了，心里怎么可能尊重。相比之下，美国人则既“虚伪又胆小”，这些雷区，是任何公众人物都不敢拿来说事的，连擦边球的玩笑都很危险，不但会受到舆论谴责，而且还可能有官司上身。

这次的情况，如果熊孩子说的是杀光非洲人，基梅尔仍然可以用蝇王来总结发言，但可以想见，接下来发生的会是：非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因此，ABC在播出的时候是不敢不剪掉这一节的，因为政治不正确。

（二）亚裔在美国的微妙地位

在这个背景下，该节目敢于拿华人说事，ABC也敢于播出，这就又要回到亚裔的微妙地位上了。为什么政治正确不应用于亚裔？

——为什么这里说亚裔，而不是说华裔呢？因为日常生活中，美国社会对你从亚洲哪个国家来一般是不太关心的，对他们而言，亚裔是一体。原因很简单，他们懒得区分。在填表的时候，一般只有Caucasian（白人）、African（非裔）、Hispanic（西裔）和Asian（亚裔）之分，而没有华裔、日裔、韩裔、越南裔这些细分的。八十年代初，由于日本在汽车工业上跟美国的竞争，汽车城底特律日渐萧条，因此滋生了一股强烈的仇日情绪，但仇视的对象却不限于日裔，而是整个黄皮肤的亚裔族群。1982年，有仇日情绪的白人Ronald Ebens和他的继子Michael Nitz向中国青年Vincent Chin（陈果仁）挑衅，进行种族侮辱，产生冲突后将后者杀害。这个案件即使在亚裔的强烈抗议下，凶手父子实际上仍未坐一天牢，未赔偿过受害人家属，也算是千古奇案。此事件后来被认为是美国泛亚裔运动的起点。而今天，基梅尔事件发生以后，日裔议员Michael Honda（本田实）也出来为华裔说话。唇亡齿寒，在美国社会，大部分时候，亚裔实际被视为一体。

而目前中国的发展跟当时日本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亦有微弱相似之处。当然，日本汽车业是直接抢了美国汽车工人的饭碗，夺食之仇自古不共戴天，而中国现在只

是成为美国的债主，更何况美国政府最大的债主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国民。目前的美国社会已经比三十年前要文明多了，少数民族的民权有实质性的改善，种族仇视从实实在在的谋杀退化到六龄童的“童言无忌”，或许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今日美国，已经没有硬碰硬的种族歧视，但族群关系仍是微妙的，而亚裔的地位，则是微妙中的微妙。亚裔是一个很老实的民族，被称为“模范少数民族”（model minority），他们普遍聪明、勤劳、上进，受教育和收入水平高于白人、西裔和非裔。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0年统计，在25岁以上人群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的亚裔占有所有亚裔的49%，而对于全部美国人口（所有族裔）而言这个比例只有28%。亚裔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为66,000

美元，而对于全部美国人口而言只有49,800美元。亚裔对政治的态度相比非裔和西裔而言比较漠然，而且脾气很好，换句话说，就是“很好惹”。——貌似一个高素质、又淡泊、又宽厚的君子群体啊，难道这个群体不应受到尊敬、并得到应有的报偿吗？

事实是讽刺的：在影视作品当中，非裔的形象一般都是光辉高大正面的，新闻里也没人敢拿他们的高犯罪率说事，因为政治要正确。而亚裔的形象就要差一些了，影片中的大英雄一般是轮不上的，往往是些比较弱小、比较呆板的形象。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亚裔也基本属于被忽视的少数民族群体。

而最令亚裔不满的，莫过于大学入学的AA制度（Affirmative Action）。平心而论，这个政策刚开始实施的60年代，亚裔的入学比率是有所上升的，但后来却渐渐处于吃亏的地位，现在大学入学的标准是亚裔>白人>西裔>非裔。据普林斯顿大学Espenshade等几位研究人员在2004年发表在《社会科学季刊》（Social Science Quarterly）上的研究，同等条件下，非裔被录取的可能性比白人高80%，西裔比白人高50%，而亚裔比白人要低17-18%。如果论分数，非裔相对白人相当于加了大约230分，西裔加185分，亚裔大约相当于丢掉50分。而2009年Espenshade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要进入私校，亚裔学生必须比白人学生高140分，才能有跟白人学生同等的机会。这个现象被称作“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在上世纪上半叶也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他们在常春藤名校的名额曾是有限制的。





白人学生对不公平状态的不满是用官司来书写的：1996年，白人学生Hopwood诉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案，是针对AA的首个告赢的案例；著名的2003年白人学生Grutter诉Bollinger（密西根大学校长）案，最高法院判密西根大学并未违反第四修正案；一个更近的案例，2008年白人学生Fisher诉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案，地方法院及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都支持学校，然后最高法院发回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重审，该案仍在进行中。而亚裔学生的案例，据笔者所知还没有上升到官司的程度（多么好脾气的亚裔同学们啊），只有SAT满分的华裔学生李简（Jian Li）曾在2006年向教育部人权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Rights）提交了一份针对普林斯顿大学的投诉（complaint），人权办公室起初以证据不

足驳回了他的投诉，但后来他提供更多证据以后，该案又被人权办公室接受，继续调查。不久，普林斯顿校报上出现了嘲笑李简的文字，引起了争议。当然支持李简维权并谴责校报文章作者的人也很多，但通过校报事件，亚裔维权需要冲破的额外障碍可见一斑。

官司累累的AA制度终于在几个州画上了句号，加州选民在1996年首先投票禁止大学入学的AA，至今已有总共八个州宣布禁止AA。其实，并非说废除了AA就可以达到入学的公平，大学在录取的时候仍然将种族考虑在内，学生中的百分比相对于总人口比重而言比例较低（underrepresented）的种族如非裔等仍然暗暗受到照顾，只是不再公开设置名额，操作更为灵活。为了学生的多样性（diversity），公平性则被牺牲。

亚裔入学的平等权利，仍然遥不可及。

亚裔，这个享受不到任何少数民族福利、在所谓的民族照顾政策下却频频吃亏、政治正确的保护伞从来都遮盖不到的“少数民族”。这是歧视吗？至少是不公平。对此，其实亚裔群体积怨已久。多年来也形成了一些亚裔民权组织，但仍然是任重道远。

（三）利益、利益

在现代社会，政治不再限于官员们的宦海沉浮、明争暗斗，也不再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美好愿望，而是包括跟每个个体息息相关的细节小事。美国是个由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博弈就是政治。尽管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每个人都免不了受到政治的影响，这一影响并不是虚幻的“民族尊严”这种面子问题就可以概括的，而是生活上的利益冲突、舆论的褒贬、种族形象（stereotyping）等等等等，入学/求职之类的人生大方向跟种族也大有关联。

作为一个自由社会里的现代公民，即使不从政，也应该参加政治生活，否则你的利益就可能受到侵害，这就是：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来关心你。参政渠道有：首先，觉得谁代表你的利益或理念，就投票给谁——非裔和西裔把不少他们族裔的选了上去，然后为他们代言。所谓代言，也不是什么种族面子的事，其实非常现实，举个具体的例子，笔者当地的非裔市长，当选以后就给非裔聚居区盖体育馆、学校、各种设施，各种政策向非裔倾斜，所以非裔下次还投票给他，而由于非裔在当地是主要人口，

他就在台上一直稳坐。华裔一则人数少，二则比起其他少数民族普遍比较淡漠选举权，即使有权投票也很多人懒得去投，即使去投也不一定投给本族人，这就造成了本族裔的议员人数少，缺乏代言人。华裔里面去当议员的少，除了华裔相对不喜欢从政以外，还有拿不到大量本族裔选票的原因。

除了选票之外还有别的方式，比如平时组成NGO，遇到事情以后签请愿书（petition）、找议员、上街举牌、静坐、游行。中国人往往觉得上街是件大事，其实不然，这是现代政治生活里面一个正常的表达方式。比如沃尔玛要把店开进一个小区，小区的头头们碰了下头，觉得行啊，就接受了，但是有些居民有意见了：沃尔玛开进来，都要吵死了，太烦人，怎么办？举牌，静坐，游行，找议员。



对游行啊抗议啊之类的事情，一个现代自由社会的公民应该见惯不怪。

(四) 自私的权利

游行静坐，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呢？以中国人的传统，那是要为了民族大义、国家大义、自由的真理才好意思上街的。但自由社会里的公民，却不需要一个伟光正的理由，他们可以、并且应该为了自身利益上街。

——甚至这个利益本身都不必特别光明正大。2006年有一个提案，要对非法移民实施惩罚，而帮助非法移民这一行为将被归为重罪。然后在全美102个城市爆发了西裔大游行，有上百万人参加。照理说，既然是非法移民，就已经站在没理的一边了，还有什么脸面提出要求呢？然而西裔非法移民在源源不断进入美国之后，源源不断地争取正式加入美国国籍、并将七大姑八大姨移民过来，然后源源不断地要求着未必完全合法的权益。加州甚至已经允许非法移民获取驾照。如今西裔已经是美国第一大少数民族，他们的选票举足轻重。事实上，合法移民们对此非常不满，而且他们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去不满，但这并不妨碍非法移民和他们的亲友团上街游行。要是换了羞涩的华裔，首先他们不会好意思上街去争取这种不太正大光明的权益，其次，国内的同胞们会斥责他们叛国、汉奸、丢脸、想做美奴而不成，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一句流传深远的名言：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同样地，权利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去争取的。

在一个已基本实现自由的国度里，总还有很多细处，需要一点一点去争取权利。这些权利里面，很多是互相冲突的，比如非裔享受AA的权利跟亚裔得到公平入学的权利，比如非法移民的权利跟合法移民的权利，比如一部分社区居民希望享受沃尔玛开进社区之后的方便的权利，跟另一部分居民享受平静小区生活的权利……

权利跟权利之间冲突的存在，意味着权利可以是自私的。一群人，为了共同的私利，组成公民组织、上街游行静坐，在自由社会中，这不是集体主义，而恰恰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个人主义的实施。

(五) 敏感的权利

很多笑话都有着刻薄的一面。当一个人不属于嘲笑对象的时候，可能觉得很好笑，但如果一个人属于嘲笑对象范围，往往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这就是为什么自嘲是高贵的，而嘲弄别人需要讲究分寸。玩笑得不合适就是冒犯。很多人伤害了他人还浑然不觉，认为自己倍儿有幽默感，一切都是对方的错，对方太敏感。

我们是不是应该教育大家说，要大度，要忍让，要努力干掉那个小心眼的“我”，要欣赏对方的幽默感，要做一个谦谦君子呢？东方文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然而在自由社会里，敏感也是一种权利。自由社会的公民只要愿意，当然可以做一个大度的人，却没有非要做一个大度的人的义务。不爽了就要表达出来。一个要求每个人都做君子，做道德标兵的社会，往往

不是自由社会；而自由社会是允许公民有私利、有小心眼，并有权利捍卫之的。没有做君子的义务，自由社会由一群遵守游戏规则普通人组成——讽刺的是，在一个不以君子标准去苛求人的社会里，道德往往更好。

每个玩笑对象对玩笑的忍耐力是不一样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是一个极宽的光谱。对公众说话，必须考虑到公众当中有较为敏感的一群。一句有分寸的笑话说出去，如果只有三五个极品敏感的人感到不满，他们即使抗议也成不了气候。而如果不满的人多了，就说明这句话可能真的有问题。其实也不限于笑话，所有的言论都存在这样一个界限。那么，是否有分寸的界限在哪里？

界限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任何一个大人物说了算的，而是经过无数次的冒犯与反击而渐渐形成的。美国种族歧视政策取消之初，仍然有一些白人说一些种族主

义的笑话，或者用一些侮辱性的词汇，现在怎么有那么大的改善？难道他们这些君子会主动改邪归正了吗？不，是在一次次的抗议中，“敏感”的黑人以及支持黑人的“敏感”的白人用行动令他们丢脸、道歉甚至下台，用高昂的代价使他们明白什么话不能说，什么玩笑不能开。

2004年，麦迪逊市电台主持人John Sylvester调笑当时的国务卿赖斯能力低下，只不过是个象征性的摆设，白宫里的“杰米玛大婶”（Aunt Jemima）。调笑政治人物能力低下属于家常便饭，美国媒体人不拿这个吐槽简直就活不下去，而公众听不到这类笑料也活不下去，但是一句“杰米玛大婶”激怒了敏感的公众。“杰米玛大婶”现在是一个食品品牌，其起源是黑人剧团表演（minstrel show）中的一首歌《Old Aunt Jemima》，是一个顺从地服



务于白人的黑人大妈形象。随后批评如潮涌来，很多电话打到电台，很多人在网上和电话中敦促电台解雇Sylvester。麦迪逊市长表态说这句话无视种族情感(racially insensitive)，而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表态说他跟威斯康星全体居民一起反对这句话(join all Wisconsinites in rejecting the statements)。

2011年，在纽约州的一个名牌私校，老教师Barry Sirmon在开学第一天对两位非裔小孩说：“我希望以后能分清楚你们俩谁是谁”(I hope I'll be able to tell you apart)。这件事闹得很大，上了一些大媒体，尽管当事人声称这是搞笑的话，是被断章取义了，最后他还是被学校解雇了。

2013年，美国名厨、食品频道(Food Network)主持人Paula Deen在一段访谈中承认自己曾经用过“N-word”(即nigger的委婉说法，人们实在避讳这个词，就跟伏地魔被称为“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差不多)，尽管只是过去用过，尽管是在被抢银行的黑人用枪指着头以后用，后来在她的餐馆里也跟雇员说过(正是她的一位白人雇员因此起诉了她)，尽管她解释说其实没那个意思(in a non-mean way)，尽管她多次公开道歉，她还是失去了食品频道的续约(相当于解雇)，以及一系列大公司的商业合同，连她的几本新书合同都被出版社取消了。

人们的神经是不是太敏感了？然而，言论的界限就是这样由一次一次的冒犯、敏感、谴责、道歉、官司、解雇渐渐划下的。此次华人的抗议，无论抗议者出于何种动机，

事实上是一种划线的行为。

(六) 罗生门

此事的后续发展，在笔者看来，是“interesting”却并不十分意外的。

没有人好意思去指责一个熊孩子，因为他只有6岁。尽管基梅尔在总结发言的时候提起《蝇王》正是暗示了人性中的恶，尽管孩童的恶其实是人性恶的一种毫无遮拦的形式，但没有几个人好意思去讨论一个6岁儿童的恶，也没什么人去挖掘这个孩子的父母和他们给予的家教。

矛头指向这个事件中的成人：基梅尔和ABC。基梅尔开始的时候是不指名的道歉，只是在节目里说起前一阵有个小孩讲了冒犯人的话，他说他以为大家都明白他并不同意小孩的话，但却不是这样的，因此他道歉，他没有想让任何人不开心的意思——哪次节目、冒犯的是谁、向谁道歉，都没有说。而ABC最开始的时候道歉信只是写给80-20的领导人Woo先生的，只是简单说明他们无意伤害华人感情，而只是为了娱乐，希望这封信解决了Woo先生的顾虑并感谢Woo先生让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

笔者个人在刚听说ABC事件的时候并不是十分关注，因为觉得在政治正确原则下，ABC和基梅尔会出来道歉的，会承认此事不合适、不应当播出的，但他们初次的草草道歉却让笔者觉得，政治正确原则原来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后来他们在抗议的压力下多次道歉，一次比一次郑重，但基梅尔仍未在节目中指名道歉，而基梅尔和ABC

的道歉信都未登上网站的醒目位置。而且其中一些话仍然激怒了华人，比如“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要是让你们生气了我很抱歉”，“我抱歉它对你们而言并不是一个笑话”。这里得说明一下，“我很抱歉做了xxx”，和“我很抱歉xxx让你不开心”其实是有区别的，而“我抱歉这个玩笑开得不合适”，和“我抱歉你们没把它当笑话看”也是有区别的。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个片段不应该公开播放，但已经有些晚了。

开始的时候有华人零星在各地举牌，华人网站上不时有人上来发照片，说自己请假去抗议了，诉求一般是“种族灭绝不能作为笑话”、“要教给孩子爱而不是恨”、“反对暴力”、“ABC/基梅尔道歉”之类。然后各地的华人组织开始行动，没有华人组织的地方也有普通网友在网上召集，最后11月9日，26个城市的华人上街游行了（也不止华

人，笔者看到照片里举牌的有其他族裔面孔）。在美国华人网站上很多图文并茂的亲历文章，游行现场比较和谐，很多人为自己亲身维权而骄傲。

游行之后ABC出了个颇猥琐的修改道歉日期的事情，他们在10日的时候把8日的一则无关声明改成了道歉声明，而不是在10日新发一则道歉声明，好让大家觉得早就道歉了嘛，你们9日还游行，真是不依不饶——杯具的是，被中国书呆子们在谷歌的缓存里抓到了证据。

（七）不同视角下的罗生门

最有趣的是事件中各方的反应。先说在美华人的反应。一些人觉得小题大作了，中国人器量太小，不就是儿童的玩笑话吗。又有一些声音认为游行是集体主义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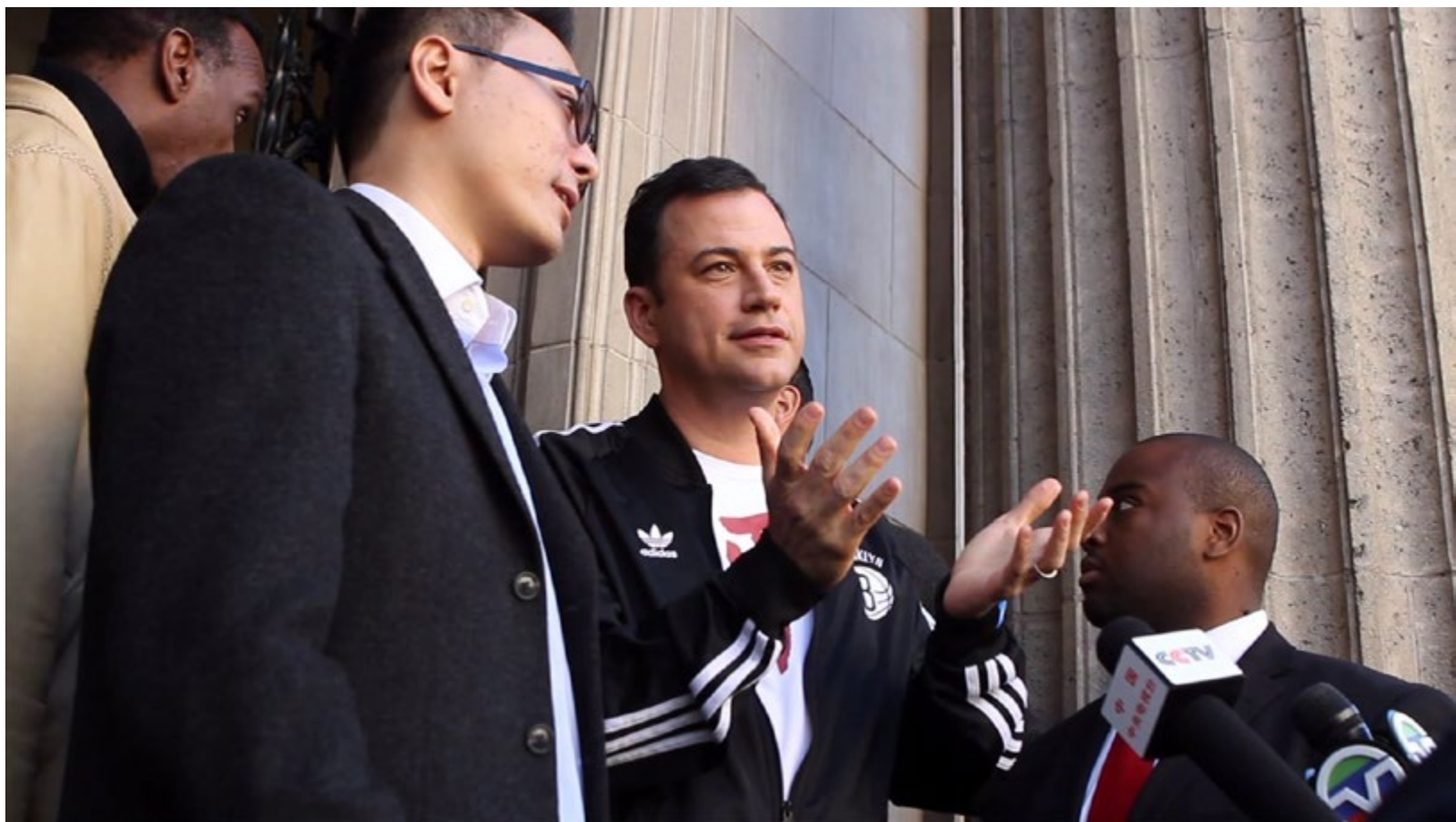
革精神作祟。另一方面，一些人出来呼吁华人政治觉醒，一些华人组织出来接受捐款并组织活动，有人发起了白宫请愿，在各大华人网站被转载，很快搜集到了十万签名。有一些人自己印T恤准备去游行，又有一些人热烈响应，捐款并表示要去参加，然后这同一群人就打不打五星红旗的事情打成一团，一方说游行是华裔维权的事，跟国内无关，打国旗只会激起美国主流社会的反感，也会令非大陆华裔感到尴尬；另一方说怕打国旗的都是奴才（此处省略一千字）。有人说80-20提前宣告胜利是争名夺利的无耻行为。有人说王浩是五毛。（此处再省略一千字。）一时间大帽满天飞。

同去游行的人里面，有些人是怀着受伤的民族自尊心和愤怒的爱国心去的，有些人是出于对亚裔地位的不满和给自己维权去的，有些人二者兼有。用任何一种单一的目的来概括游行的人群，都是不恰当的。

这件事在国内关心的人不是特别多，除了那些爱国心/民族自豪感爆棚的人以及特别在意面子的官媒，普通人并不见多少谈论。因为如果不把美国的复杂种族现状和民权运动的漫长历史考虑在内的话，这个事件并非大事，而这些背景，没有在美国长期生活的人，是并不了解亦无切身感受的。

还有一些人因为游行要求ABC加强审查就大为着急，把这种审查跟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混为一谈。其实美国的审查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种族仇恨言论出现在节目里，如果非直播，过后是要剪掉才能播出的，不剪会引发轩然大波。ABC最近的道歉信里面说以后会加强审查，只是指过滤这类言论。

美国人的态度也相当多样化。很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也不关心——这并不令人惊讶，自大的美国人就是这样的。知道这件事的美国人的评论也



是各种观点都有的，就像中国人之间存在分歧一样。有的美国人认为基梅尔道歉简直是没完没了，华人为什么不善罢甘休。而有的美国人认为在电视上公开说杀光xx人是不可以的，亚裔一直不是爱哭的小孩（crybabies）因此没奶吃，对于类似事件总是忍，总有这么一次他们不忍了，而种族歧视有多种形式，有时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歧视。

各种争议之间，最丑陋的当属中国政府插手的阴谋论，游行的人每人能拿70美元，还有盒饭吃。虽然笔者知道很多人在非周末游行的时候是请假去的亏本生意，119的周末游行也是又出汽油费又捐款的亏本生意，就为了去给自己维权；根据所见所闻，笔者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自发的，但也想知道到底有没有、有多少人吃到了盒饭，拿到了传说中的70刀。照天朝官方的行事方式，这不是完全没可能的。如果这是真的，将会使得本意在维权的那部分华裔相当尴尬。

又有说中国官方通过迪斯尼向ABC施压——对此华裔的态度也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国内势力的插手造成事件已经变味了，另一派认为不妨借助国内势力。至于两派在网上的争论过程，再次省略一千字。笔者已见怪不怪，只是在想，在有中国人的地方为什么经常看见这种乱象：政治往往不是利益博弈和辩论，而是互泼污水的脏事和暗箱交易。墨镜先生的流亡还令人记忆犹新，当时国内有一些人不觉得这是维权，而觉得是美帝势力插手。而同样地，如今华裔对自己地位不满而出来维权，一些人觉得这些华人组织是得到了中国势力的暗地支

持。这种冷战思维几时休？又或许，冷战其实一直都阴魂未散客观存在。

前面说过，大部分时候美国社会待华裔与其他亚裔并无区别，然而也有例外，那就是冷战思维出现的时候：华裔相比其他亚裔，有一个特殊的祖国。一个很有效地引发普通民众反感的办法，就是去怀疑某事的背后有对方阵营的插手。

（八）罗生门之后

11月9日的游行是此次事件的高潮，之后很多人觉得该发的声已经发了，正式道歉也已经得到了，可以适可而止了。主张继续的人数相对较少，他们多是比较激进的人，仍然想继续游行或打官司直到基梅尔下台。

但事实上，理性的人们已经开始对事件进行反思，并想着下一步了，他们开始在网上讨论如何增进亚裔民权，如何争取议员的支持，如何培养下一代的政治家、媒体人和律师，如何建立并维持公民组织。这次的事件固然不是亚裔民权运动的起点，至少也是其中的一项进展和组成部分。

这些行动，跟母国并无多大关联。中国官方或民间感受到的只是面子受损，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起辱华事件，跟在美华裔之捍卫切身利益全然不同。大环境不同，感受不同，出发点自然迥异。可以说，这件事从国内的角度，跟华侨的角度来看，是不同性质的两件事。

有人说，国家不富强，华侨在海外就没有地位，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华侨在美国的地位是要由他们自己争取的，他们人数不

够，争取得也不够。一个典型的反例是：在美的非裔、西裔的背后都没有繁荣昌盛的祖国为后盾，但由于他们的积极争取和人数众多，政治地位却相当高，媒体和政客争相讨好，生活各方面享受少数民族的福利。

事实上，天朝并不曾怎么真正关心过海外侨民的人权状况，除非它在其中有利益牵扯或者影响到面子。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98年的印尼排华事件，中国只是表示了“强烈关注与不安”，而美国却对印尼政府施压，并为印尼华人提供救助和庇护，以至于被救的印尼华人在抵达美国的时候打出横幅“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

在美华人虽然不会像绝处逢生的印尼华人那样打出美国狗什么的横幅，但他们知道，他们在美国的地位，不能指望母国，而必须自己去争取。政治跟每个个体切身相关，在公民社会里，参与政治、争取权益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份内之事。Q



格陵兰的泳者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文景

博客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多看阅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